

摘 要

15-18 世纪是史学界公认的西方文明的近代转型期。在这一时期，西方文明成功地实现了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方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深刻变动。这些变动发生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结果是，所有生活于这一文明内的组织机构；所有这一社会内的无论其所处阶层和身份地位的人们，都毫不例外地受到强有力的影响和冲击。教会也不例外。

作为古代罗马社会保存下来的最大的社会组织机构，教会在这一时代所受到的冲击是深刻而广泛的。教会必须对着变动的社会做出反应，生存还是死亡？面对挑战，教会选择了调整自己以适应改变了并正在改变着的世界。为了实现这一转变，教会开始了自我改造过程。这是通过对自己进行“从信仰到仪式，从成员到首脑”的改革来完成的。在教会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一时代的过程中，1517 年，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奥古斯丁修道院的一名修士马丁·路德发起了“宗教改革”运动。面对这一“新信仰”的威胁和挑战，天主教的改革运动的步伐明显加快。

像历史上所有的改变以适应不同的时代一样，经过改革，教会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变得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教会不仅仅是这一变动社会中被动的承受者，也对塑造这一社会的过程中施加了自己强有力的影响。这一影响不仅体现在欧洲本土，还远远地延伸到海外。在这一意义上说，教会适应社会变动的行为不仅在西方文明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还在近代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天主教改革；反宗教改革；民众信仰；重新基督教化；海外传教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15th to 18th century is acknowledged by the scholars of history the times of transition of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this period,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completed the transition from Middle Ages to the early modern society. During the course of this transition, deep changes happened in western society. Maybe it is the strongest impression felt by all the scholars who study this times' history. The changes can be found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all in all, in all the aspects of this society. As the result, all the institutes and people with any kind of identity or stratum, in Western society were affected.

The Catholic Church is affected by the changes too. As the only institute survived from the ancient Roman culture, the Church felt this strong impact deeply and widely. The church must make response, to choose to vanish or survive in this society. Facing the challenge, Church chose to make itself adapt to the changed and changing world. To make this object realized, the church begins to refashion itself, which is the reform of itself "from Religion to Sacraments, head and members". In the course of the catholic reform, in 1517,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launched by a friar of Augustine monastery in the Holy Roman Empire happened. Facing the challenge and the threat of the new faith, the refor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ccelerated.

As all the adjustments adapted to the different changing times or circumstances in Church's history, it not only survived but also became more lively and energetic. As one component of the society, during the course of its reform, it is refashioned by this world,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refashioned this world. This can be felt during its reform and after its reform, especially the latter is obvious. Whatever how we mean about reform, the effect of the reform and the reformed church can be felt in the native land, Europe, as well as in the world. That is the huge lands of America, Africa and Asia. In this sense, the chur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real world history."

Key words: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popular religion; the Re-Christianization; the missionary in the world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东北师范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韩振秋 日期：06.6.13

学位论文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东北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东北师范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东北师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韩振秋 指导教师签名：王晋新
日 期：_____ 日 期：06.6.13

学位论文作者毕业后去向：

工作单位：_____ 电话：_____

通讯地址：_____ 邮编：_____

引 言

（一）问题的缘起与选题依据

“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①它是人类灵性之花，是文明的母体和内核。在许多民族中，它起着具有凝聚力的支柱作用。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孕育了西方文明的是天主教。它深入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进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与西方文明社会的结合是这样紧密，以至于任何抛开它来认识西方文明的努力都是不可想象的。近代早期（15-18世纪），西方文明开始了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历程。转型后的西方文明不仅在欧洲本土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而且通过向海外延伸，直接参与并促成了世界历史的行成，并将其推进到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一转变所造成的结果，直到今天依然可以深深地为我们所感觉到。一直以来，人们在谈到西欧近代社会形成时，多强调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国家、海外航路开辟的作用，而对天主教在这一过程中的转变和作用则少有问津。事实上，前述一切变化中都打有天主教深深的烙印，没有天主教方面的相应转变是很难对欧洲实现这一转变过程获得完整的解释的。它们之间不是时空上的陌客，而是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在和谐和矛盾中对西方文明实现近代转型起着推动作用。尤其是宗教改革，它不仅脱胎于天主教，更是在与天主教激烈的对抗和斗争中存在和发展变化着的。认识天主教在这一时段的历史是完整、合理地解释近代早期发生在西欧所有历史性转变的一个关键因素。

长期以来，对天主教在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的历史的认识是在“反宗教改革”这一视角下进行的。“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出现于1776年，创设者是德意志哥廷根（Göttingen）的一名法理学家皮尤特（Johann Stephan Pütter, 1725-1807），他是一名新教徒。在他的眼中，“反宗教改革（Gegenreformationen）”指的是从奥格斯堡和约（1555）到威斯特伐里亚条约（1648）签订之间，天主教对新教所属各地区的武力占领以及对新教信徒的强迫改宗。作为法律术语，复数形式的“反宗教改革”，最初使用范围仅限于德语地区。到了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的新教学者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将十七世纪以来流行于德国的“宗教改革”一词与皮尤特创设的“反宗教改革”进行了系统的改动和界定。他去掉了“反宗教改革”的复数形式，而将其作为一个指称教会从1555-1648年的一系列行为的专有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版，第199页。

名词创设出来。以对应其将 1517-1555 年定为宗教改革时代的划分方法。从此，借助于兰克在史学界巨大的声望，与宗教改革在同一个框架内进行着对抗的“反宗教改革”被带到了世界各国的学术界。

在这种标签下，天主教在近代早期的行为被简单地定义为对新教的被动性反应。深深地受到新教研究以及相应的价值判断的影响。尤其是在教派分裂和斗争的事实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一状况下。当新教与近代社会的形成以及与资本主义挂上钩后，就更是如此。这主要受益于两大学派。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学派，这一学派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此，宗教改革被看成新兴的市民阶级反抗封建势力的斗争，恩格斯更直接宣称：“宗教改革——路德的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这是包括农民战争这一危机事件在内的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①另一个是马克斯·韦伯的文化作用论。在其享誉世界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认为，在近代资本主义形成和上升的过程中，新教，主要是加尔文的新教的道德伦理观念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样宗教改革逐渐获得了近代、进步的标签。而它的对手被笼罩在“反宗教改革”的阴影下，成为落后、保守、反动的同义词。

无论天主教在近代早期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反宗教改革，用这个词来对天主教在近代的行为进行指称都是不完善的。它将对天主教的认识限定在对新教的认识框架中，约化了天主教在近代早期丰富多变的社会中所做出的反应的多重性。在实际操作中，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结果必然误导和模糊我们对近代早期天主教历史的正确分析和认识。鉴于天主教对西方文明在近代早期社会转型中的关键地位。反宗教改革这一视角显然不利于我们对西方文明转型期的研究。

反对的声音一直存在。天主教存不存在适应近代早期时代变化的反应？如何界定这种反应？这既有教派的考虑，也有严谨的历史使命的审视。1888 年，也是一个新教学者，马琳布洛克（Maurenbrecher），在考察西班牙前宗教改革教会状况后，有感于天主教在此一时代、此一国家旺盛的生命力和适应性。提出了“天主教改革”这一概念。此后，不断有学者加入这一探寻之中。这些学者越来越强调天主教对时代的反应性行为，而不仅仅将其看成传统的仅仅是对新教的反应的“反宗教改革”。伊文尼特就认为，反宗教改革首先是一场强有力的宗教运动，是天主教对近代社会的适应性反应。“然而，它不仅仅是对中世纪宗教教导的简单重申，它实际上创造出带有自己鲜明特性的成熟的精神，在这一精神上，它所处时代的印记和这些印记的气息在许多方面是清晰可辨的。”^②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逐渐丰富起来。埃蒙·杜菲《劫掠祭坛》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个。通过对前宗教改革时期英格兰天主教信仰的考察，他发现，“传统的天主教信仰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宗教改革前后并没有出现枯竭或衰退的迹象，而且其自身拥有自我调节以适应环境的能力。”^③如此看来，重新审视涵盖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459 页。

^② H. Outram Evannet, "Counter-Reformation Spirituality", in David M. Luebke,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The Essential Readings*, Malden, Mass.: Blackwell, 1999, p.48.

^③ Eamon Duffy, *The Stripping of the Altars: Traditional Religion in England 1400-1580*,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36.

反宗教改革概念下的天主教在近代早期的历史就更为必要。

依照的这样的思考和理念。笔者的目的是通过对这一历史性社会转型时期天主教会方面的行为进行简单梳理，考察天主教在近代早期面对那些挑战？人们在宗教信仰中以及教会这一社会组织中出现了那些变化？教会面对这些新情况的出现，客观上应该做出如何反应？它是否做出了必要的回应？这种回应是否真实有效？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增强对天主教在近代早期西方历史中地位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对近代世界历史形成过程获得更深层次的感知和理解。这不但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也具有宝贵的现实价值，因为治史是为了鉴今，研究近代早期天主教这一近代西方社会中最大的社会实体在近代早期的转变过程，对于所有为适应时代而努力的国家和组织机构都有借鉴意义。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考虑到，虽然从 1517 年开始，几乎在天主教的所有行为中，都可以看到新教的影子。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所倡导的新教运动毫无疑问是天主教会在近代早期面对的一个挑战，也许还是最直接、最具威胁的挑战，但根据笔者的理解和写作意图来看，从根源来讲，近代早期的天主教和新教都脱胎于 1517 年以前的那个罗马公教会，而我们考察的起点虽然从此出发，但重点却不是新教。将新教放进天主教改革的动因之中，不仅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也容易导致传统的反宗教改革之嫌。为此，笔者在具体写作过程中，是将新教改革作为一个既成的事实来看待的，如无必要，不做更多的解释，相关的知识在一般的历史教材和宗教史书籍中都可以找到。在本文的写作中，它是作为与天主教同时共存的背景而与天主教的行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对于本书中的一些概念，有必要在此予以界定，以避免误导读者。对于本文中频繁出现的天主教一词，如无特别说明，笔者沿用的是伊文尼特的观点，他曾说“这个词，我指的是西方中世纪教会中依然处于罗马掌握之下的信仰和组织。”^①也即奥麦雷^②所说，其涵盖的是新教改革前属于天主教而新教改革后不属于新教的那个教会组织。对于反宗教改革，笔者在使用时，指的是天主教在与新教对抗和斗争中所使用的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方式和手段。但尽量避免传统使用时含有的价值判断。对于新教一词，我指的是 1517 年路德所肇始的那场最终导致中世纪天主教分裂的宗教运动中所出现的所有非天主教教派。但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它们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基于不同信仰之上的各个“教会”或“教派”的泛称或共同体。同时，这些新“教会”的出现在时间上也不是同步的。

天主教不仅是一个古老的信仰，也是西方社会中一个庞大的组织。它的触角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天主教就是研究一个文明，而这对于本文作者来说，无论从理论构建还是知识的结构方面都不足以胜任这么庞大的工程。在本文中，我只是尽我所能，在一个最肤浅的层面，对天主教在

^① H. Outram Evannet, "Counter-Reformation Spirituality", in , David M. Luebke,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The Essential Readings*, Malden, Mass. : Blackwell, 1999. p.48.

^② John W. O'Malley, *Trent and all that -Renaming Catholicism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近代早期面对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及这种解决对教会、对它所处的时代造成了怎样的冲击进行最一般的描述。

这样的研究本文作者认为也不是没有价值，它至少可以在国内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更前一步，为我们勾画出一幅相对清晰轮廓，而这对我们认识以至研究天主教在近代早期的历史无疑也有所裨益。

（二） 研究现状分析

国内关于天主教在近代早期的历史的研究一直很薄弱，至今尚无专门论著。诸多的关于宗教改革时期的天主教的论述散见于通史和宗教史著作中。如杨真：《基督教史纲》^①，马超群：《基督教二千年》^②，罗竹凤主编《基督教通史简编》^③等，这些著作的版本比较旧，采用的观点分歧很大。一般来说对宗教改革的评价比较积极，而对“反宗教改革”大多数是持否定和批判的眼光。多将其定义为反动、落后、封建、保守的旧势力对新的积极的进步的新势力的反攻倒算！近几年，由于借鉴欧美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在新出版的著作和论文中，逐渐给与这一时期天主教方面以更多的关注。如朱孝远所著《近代欧洲的兴起》^④王新中博士的《对欧洲中世纪天主教改革性质的理论思考》^⑤彭小瑜教授在《教会史的学科界定与方法论》^⑥关于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研究状况相应地进行了介绍和评述，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看法。

相比之下，欧美学者对天主教在近代早期的研究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取得了丰富的成果。1946年，胡伯特·耶丁发表《天主教改革还是反宗教改革？》一文，开始对此前的关于天主教在宗教改革时代的行为的认识进行重新审视。他认为，不能否认新教改革对天主教会改革的刺激作用，但是教会改革的根苗远远早于路德之发动的宗教改革，改革后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的天主教确实也发动了反宗教改革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不能将天主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割裂开来，“这不是一个二者选一的问题，而是一个二者兼而有之的问题。天主教改革是教会通过内部复兴的过程朝向教会生活理想的重新定位。而反宗教改革是教会在反对新教的斗争中对自我的不断伸张。如果天主教改革是精神，那么反宗教改革就是其躯体。”^⑦

几乎同一时期，英国学者伊文尼特也提出与耶丁相似的结论。伊文尼特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在天主教信仰的特性及其影响，侧重于文化方面。他认为反宗教改革首先也是最主要的是一场强有力的信仰运动，视角对变动社会的一种适应性反应。只有这样

^① 杨真编著：《基督教史纲》，上海：三联出版社，1979年。

^② 马超群：《基督教二千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

^③ 罗竹凤主编：《基督教通史简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④ 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北京：学林出版社，1997年。

^⑤ 王新中：《对欧洲中世纪天主教改革性质的理论思考》，《山西师大学报》，2001年4月第2期。

^⑥ 彭小瑜：《教会史的学科界定于方法论——以宗教改革和宗教裁判所研究为例》，《西学研究》，2003年第1辑。

^⑦ Hubert Jedin, "Catholic Reformation or Counter Reformation?", in David M. Luebke,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The Essential Readings*, Malden, Mass.: Blackwell, 1999, p.45.

认识,我们才能对这一场运动达到深层次地把握。出于这样的考虑,伊文尼特感到有必要对原有的概括性词汇“反宗教改革”的内涵进行必要的扩充。他说:“这个程式的目的不是想巧妙的将‘反’这个词从“反宗教改革”这一概念上剥去,而是为了在一个更宽泛的层面上拥抱它。”^①此后,瓦尔特·蔡登^②对以往的“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历史划分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不应该将这个时代用“反宗教改革”来指称,因为这样做会对人们产生误导,由此提出了一个替代概念:“信仰时代”或“信仰斗争”。而对于传统的名词“反宗教改革”不如称之为“竞争的宗教改革”。

关于反宗教改革的研究以及相关的争论激发了学者们对于这个领域的兴趣和关注,一批批学者投入到对这一时期天主教会的研究中来。新的认知视角反映到此后的学者著作中,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翻译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二卷^③和第三卷^④,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信仰时代》^⑤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的《牛津基督教会史》^⑥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合著的《世界文明史》^⑦等关于天主教在近代早期的历史都进行了比较详细介绍,丰富了本文作者相关的知识。尤其是关于天主教在海外发展的论述弥补了作者的认识不足。鉴于在研究中,词汇日益繁多及其内涵在使用上的含混容易造成误导,对此会的整理和阐释就显得十分必要。为此,约翰·W·O'麦雷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在《特伦特及其相关》一书中,详细地对此前指称天主教的词汇如“天主教改革”、“反宗教改革”、“信纲主义”(Confessionalization)、“特伦特时代”(Tridentine Era)等,分别从缘起、涵义、优点和不足之处进行介绍和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建议使用“近代早期天主教”他认为,这个概念更有弹性,更少判断性,能够将现存各种概念和分歧包容起来。他的研究使笔者对研究近代早期天主教的学术发展过程的感知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同时,也使笔者对本文的定位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反宗教改革”所涵盖的范围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所拓宽,研究的视角也不再拘泥于将其与新教看成水火不容的两面,而是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上,将二者纳入这个时期的社会中予以完整公正的认识和评价。这方面的研究以米歇尔·马莱特的《天主教改革》^⑧;罗伯特·贝瑞雷^⑨的《天主教的重塑 1450-1700:反宗

^① H. Outram Evannet, "Counter-Reformation Spirituality", in David M. Luebke,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The Essential Readings*, p.48.

^② 恩斯特·瓦尔特·蔡登:《信仰斗争时代 1555-1648》,载于[德]马克思·布劳巴赫等著:《德意志史·从宗教改革至专制主义结束·上》(第二卷),陆世澄、王昭仁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

^③ [英]G.R. 埃尔顿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宗教改革》(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④ [英]R.B. 沃纳姆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反宗教改革与价格革命》(第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⑤ [美]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信仰时代》,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

^⑥ [英]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会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⑦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著:《世界文明史·第二卷》,罗国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⑧ Michael A. Mullet,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⑨ Robert Bireley, *The Refashioning of Catholicism 1450-1700: A Reassessment of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教改革再审视》和 R·赫希亚^① 所著《天主教复兴中的世界 1540-1770》为代表,将天主教方面的行为放在一个历史长时段中进行考察,力图准确真实地把握这个时代的面貌。其中,三人的侧重点是不同的。马莱特强调天主教行为的历史延续性和继承性;贝瑞雷侧重于考察天主教与时代、社会的互动关系,强调适应性,但更关注于对教俗关系的考察;何西亚则从全球史观入手,其研究中,伊比利亚半岛以及西方文明的社会的微观层次受到他的强调。这些研究开阔了笔者的视野,对笔者的写作视角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而马丁·琼斯^② 在其《反宗教改革-近代早期欧洲的信仰和社会》一书中,则精致地选取了相当丰富的历史材料以揭示这一时代信仰和社会的关系以展示信仰的基础。加深了笔者对自己写作目的和依据的深刻感知和理解。

十六世纪是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纪,虽然宗教问题是这个时代的王牌产业,但诸如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民族国家形成,地理大发现以及相应的海外拓殖多不能不予以关注,因为对于一个时代来说,影响其形成和演化的因素是极其多重而复杂的。同样,各种因素的演变和走向也必然是在相互影响和制约中进行并被这种相互作用所塑造。这样看来,将“反宗教改革”放在这个视野中来加以认识是有利于我们在更深层次上对其进行把握的。L·W·科威^③的《十六世纪的欧洲》;西尔维娅·萨洛普^④的《中世纪的社会变迁》和汉斯·J·海勒布兰德^⑤的《十六世纪的人及其思想》等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使笔者丰富了对这一时代西欧社会的深层了解和适当的把握。

研究此一时期天主教的行为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和冲击的程度,是正确衡量和评判天主教行为及其效果的一个重要的尺度。雷金纳·包特纳^⑥的《1580-1630 年中欧斯蒂娅地区的反宗教改革》与奥尔·比德·葛瑞尔等著《欧洲反宗教改革时期的济贫和救护》^⑦以及吉琳·T·W·埃波尔葛瑞恩^⑧所著《阿维拉的特里莎与教会的圣徒政策》分别对特定的地区;社会福利和救济;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行为以及教会册封圣徒的政策进行了考察。为笔者衡量天主教改革对相关领域的冲击提供了详实的写作依据。

虽然欧美学者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留下的空间仍是很大的,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也依然有伸缩的可能。教会本身的二重性(即精神性和物质性,)中,信仰(精神性)无疑是人们最为关注的方面,因为这是教会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基础。近代早期发生于天主教历史中的事件,首先应该从其信仰中以及影响其信仰的因素中寻找原因和解释。因此,为达到深化理解历史的目的,尤其是西方文明在 15-18 世纪近代转型期的历史,对这一时期中发生在宗教上的事件进行梳理,清晰思路,考察并

^① R. Po-chia, Hsia, *The World of Catholic Renewal 1540-1770: A Reassessment of Counter-Reform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② Martin D.W. Jones,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③ L.W. Cowie, *Sixteenth Century Europe*, Hong Kong: Wah Cheng Printing Press, 1977.

^④ Sylvia L. Thrupp, ed., *Changes in Medieval Society*, New York: Meredith Publishing Company, 1964.

^⑤ Hans J. Hillerbrand, *Men and Idea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Inc., 1969.

^⑥ Regina Portner, *The Counter-Reformation in Central Europe Styria 1580-163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⑦ Ole P. Grell, et.al., *Health Care and Poor Relief in Counter-Reformation Europe*,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⑧ T.W. Gillian Ahlgren, *Teresa of Avila and the politics of sancti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重新的审视传统的反宗教改革的历史演进轨迹，既有必要性也有一定的可行性。

（三） 本文的研究方法、手段与基本框架

在研究中，我们自始至终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为指导，在从整体上对国内外关于反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会的认识和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分析的过程中，将宏观文明视角与微观个项分析相结合。综合运用神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原理与方法，同时借鉴文本学、语言学与修辞学的研究方法，通过横向的类型学，纵向的发生学比较，结合近代早期发生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方面的变化，从整体上把握天主教在近代早期，即传统以来的“反宗教改革”时期的历史，以解释在这一社会转型时期天主教方面的种种行为，提出合理的解释，如实地反映和解释这一时代的图景。希冀通过广收博蓄，可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新问题，获得新的认识

本论文共由导言、正文、结论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又分为三部分：

引言：阐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现状，界定相应的概念，提出自己的选题依据。

一、变动社会的新挑战：详细分析发生于近代早期欧洲社会中的变动对教会在信仰和组织机构和成员中的影响，明确教会客观上面对的任务。

二、天主教改革：分析教会改革的全过程，揭示其行为与面临的挑战之间的紧密关系。

三、天主教复兴：分析教会的应变性行为的真实有效性，其主要的体现点在其与新教的关系，与民众信仰以及海外传教三个方面。

结语：通过对天主教在近代早期行为的分析，得出天主教在近代早期的行为是对这个时代的适应性反应，而不仅仅是“反宗教改革”。

一、变动社会的新挑战

（一）教会威望的降低和控制力的减弱

当我们投身于中世纪晚期的西欧社会时，漫布于这时代的最响亮的声音莫过于要求教会“从头到脚”进行改革的呼声和种种关于改革的建议。与之紧密相连的是对教会及其成员的无尽指责。对于这些，常被新教学者及其支持者援引来为宗教改革的合理性提供依据。事实上，新教改革所面对的所有问题，也是天主教不得不面对并予以解决的。情况也远没有人们估计的那样严重，根据对宗教改革前英格兰民间宗教信仰的研究，杜菲认为：“传统的天主教信仰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宗教改革前后并没有出现枯竭或衰退的迹象，而且其自身拥有自我调节以适应环境的能力。”^①

引起人们对要求教会改革的原因事实上是极其复杂的。人们基于自己不同的身份和地位提出的要求是迥异的。但其最终的指向却都表现为对教会及其成员的极度不满。教会和教皇成为人们讽刺和猛烈抨击的对象。关于米德夫人（Meed, 贪婪的代名词）的描述时时围绕着罗马^②。这方面，人文主义者的带有夸张性的描述最为有力。但丁的《神曲》和胡藤（Hutten, 1488—1523）的《鄙人书翰》中都对教士中存在的贪婪和道德的堕落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抨击。而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of Rotterdam 1469?-1535）的《愚人船》更是对教会从头到脚极尽嘲讽之能事。

人们的指责并不是空穴来风，教会中确实存在弊端，对此，“任何一个认真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否认这种弊端的存在。”^③当时，许多教士不学无术，文化水平低下，缺少足够的宗教知识和履行职责的能力。对自己的宗教职责漠不关心的教士很多。“例如，当时有一位马哥德堡德大主教，在任职 35 年后才第一次主持弥撒。”^④擅离职守现象也很普遍。“在法国的森样（Sens）主教区，在 1495 年，在所有对教区负有责任的人中，60%以上都不在自己的岗位上。”^⑤在米兰，卡洛·巴洛米奥入驻之前，已经有 80 年没有驻地主教。相当多的教士违背独身的宗教誓约，公开或隐蔽地蓄妾（Concubage）。修道院的纪律也松懈下来，许多修道院成了淫荡和放纵的场所，在“公元 1512 年，方济各修会修士托马斯·慕那在讲‘道’中揭露，有一个女修道院的院长是该修道院中私生子最多的人。”^⑥这种道德堕落在教皇中也不鲜见，“在新教革命

^① Eamon Duffy, *The Stripping of the Altars: Traditional Religion in England 1400-1580*,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36.

^② John A. Yunck, "Economic Conservatism, Papal Finance, and the Medieval Satires on Rome", in Sylvia L. Thrupp, ed., *Changes in Medieval Society*, New York: Meredith Publishing Company, 1964. pp.72-75.

^③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著：《世界文明史·第二卷》，第 183 页。

^④ 王新中：《对欧洲中世纪晚期天主教改革性质的理论思考》，《山西师大学报》，第 99 页。

^⑤ N. S. Davidson,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7, p.21.

^⑥ 王新中：《对欧洲中世纪晚期天主教改革性质的理论思考》，《山西师大学报》，第 99 页。

前统治了二十五年的英诺森八世据说有八个私生子，其中有几个是他当选教皇以前所生的。”^①至于酗酒、斗殴、出入妓院等现象在教士身上更是屡见不鲜。对财富的贪欲竟驱使一些教士在自己所在教区开设赌场、妓院。原本培养虔诚信仰的赎罪券也为教皇作为聚敛钱财的手段而大规模地被售卖出去。

对教会的指责背后掩盖的是教会在社会上的地位的降低和控制力的减弱。权威的丧失是理解人们对教会不满并要求其改革的关键。而这既与教会过往的历史有关也与现实中出现近代君主国家的出现和地位的上升有联系。

中世纪后期发生的教会史上的“巴比伦之囚”^②（1305-77）和教会的“大分裂”（1378-1415）严重地影响了教会在信徒心中的形象和地位，教会的威信降到历史的最低点。虽然教会在阿维尼翁这一有利的地理位置更能发挥其作为普世教会的功能，但人们不能容忍这个全体基督徒的教会屈从于法国一个国家。更不能容忍其对圣彼得的永久驻节地、教会的精神之源-罗马的背离。而随后几个教皇争夺圣彼得继承人的闹剧更长久地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留下了丑闻。人们难以理解更不能接受作为上帝在尘世的唯一代理人、圣彼得的继承人竟然会变成两个以至三个。而他们之间的攻击谩骂，以及在几十年之间所玩的阴谋诡计更令虔诚的人们痛心疾首。不仅如此“一直延续到1449年的罗马天主教的分裂产生一个后果，他削弱了教会的所有戒律，从而导致各级教士道德日益败坏。”^③

返回罗马的教皇远没有恢复既往的声威和地位。在教会内部，教皇和公会展开了对教会最高领导权的长期争夺。教皇的最高宗教地位受到公会议主义的挑战和威胁。结束了教会大分裂的康斯坦茨公会议上，公会议主义思想达到其威望的顶峰。宣称其权力来源于基督，是全基督教世界的代表，在随后的巴塞尔公会、比萨公会上，与教皇的宗教权威形成对抗。急需一个稳定的权力中心来对教会的威信和控制力进行恢复的任务被消耗在争夺之中。虽然教皇最后取得胜利，但公会议主义思想却远没有消失，对教皇的地位依然构成潜在的威胁，这不能不对教皇宗教职能的发挥起到严重的牵制作用。为了恢复教会和教皇的威信和权威。回到罗马之后，教皇们大兴土木，开疆拓土，大力扶植人文主义运动。但结果却是教会越来越深地卷入世俗政治和文艺复兴的奢华之中，加剧了教会世俗化的进程。从而在事实上，将一个普世性的教会降为意大利的一个地方诸侯。教会腐败滋生，弊端横行的现象不但没有得到制止，反而更加严重。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指责。人们希望教会回到信仰事务中来，对自己的组织机构进行调整，对教职人员的风纪进行整肃。以满足日益高涨的宗教寻求。

在外部，借助于民族主义兴起所提供的有利条件，世俗君主在与教皇围绕主教授职权；对神职人员征税以及司法审判权而展开的争夺中越来越处于有利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与公会议主义结成联盟，迫使教皇做出一次次让步。结果，各世俗君

^①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著：《世界文明史·第二卷》，第183页

^② 指此期间，教会移居法国南部阿维农。阿维农当时在法理上属于教会，但由于其靠近法国，受法国影响很大，该时期的教皇多为法国人担任，故引起基督教世界的反对，人们用古代的“巴比伦之囚”来对此暗指教会偏离了自己的神圣性源头——圣·彼得的罗马。路德曾写《教会的巴比伦之囚》一书，以为自己的改革运动提供合理性依据。

^③ [英]托马斯·马丁·林赛：《宗教改革史》，孔祥民、令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22页。

主在实质性问题大多获得了最终的决定权。法国国王获得对几乎所有法国教会高级神职人员的任命权。1482年建立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在建立之初就处于西班牙王室的控制之下，而几乎与教皇没有真正的隶属关系。在强大王权的保护下，英格兰教会只是象征性地向教会交纳微量数额的贡赋。宗教事务的履行越来越需要君主的认可和支持，教皇的宗教职能和权威受到严重的限制。

虽然上述一切已足以使人们提出教会改革的要求，但这还不足以解释问题的全部。事实上“并没有迹象显示教会对自己职责的履行完全不负责任。在天主教统治的中心地区，西欧，即有的宗教组织机构继续发挥自己的功能。”^①发生于教会上层的事情，普通信徒很少有兴趣去关注，也缺少这种渠道。激进如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 1452-1498）者也依然坚信教会需要教皇和教廷这样的组织和机构来维持教会的运转。腐败和滥权行为对教会来说并不新鲜，违反道德和教士的玩忽职守、普通信众中对信仰的无知和迷信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但这一切在过往的世代中并不必然影响教会正常发挥自己的功能。能够对现实进行解释的只能是现在受教育者和大众思想的主导者们看待这一状况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人们这种对教会态度的转变除了在教会的组织机构中有其存在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人们对教会的期望值在中世纪晚期变得更强。“这种教会形象掩盖下的是人们急迫的信仰渴求。”^②这只能从这个时代人们的信仰中去寻找原因。

（二）变动的社会与信仰热情的高涨

长期以来，教会在中世纪的历史被描绘为处于不间断的腐化堕落之中。“堕落的教皇主宰着神学上已经破产了的教会，向无知和盲从的人们不停地叫卖一种假冒神学的迷信：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关于宗教改革前夜的天主教会形象。”^③对这一认识，已经为近来学者们的研究所颠覆，与以往我们的判断大相迥异的是，“前宗教改革时代的教会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它的新教对手所批评的那样是信仰的沙漠。”^④而是到处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这一宗教热情的高涨可以在许多方面得到证明。借助于印刷术的发明，信仰方面的书籍广泛流行。《效法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基督的生平》（*Life of Christ*）等培养虔诚信仰的书籍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据说，从活字印刷术发明到宗教改革爆发之间出版的所有书籍中，关于信仰方面的书籍占了一半以上。”^⑤各种针对不识字群体的雕刻和图画充斥于社会之中，《神圣家族》和圣母的图像为各个家庭所悬挂。上到王侯下到普通百姓为追求“圣化”，都加大了对神圣之物的搜寻力度。“在十六世纪

^① R.N. Swanson, “the Pre-Reformation Church”, in Andrew Pettegree ed., *The Reformation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10.

^② [荷兰]约翰·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刘军等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163页。

^③ Martin D.W. Jones,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6.

^④ N.S. Davidson,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p5.

^⑤ Hans J. Hillerbrand, *Men and Idea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Inc, p10.

英格兰的亨利七世珍藏着他王国的保护人圣·乔治的一块腿骨；而萨克森的大主教，路德的保护人，选侯弗里德里希在威登堡的教会中对圣徒遗物进行收集，到1509年登记在案的已经达到5005件，包括204具哈罗德杀死的无辜少年的尸骨、摩西的一块烧焦的木柴，基督幼年摇篮的一小块和十字架的三十块碎片。”^①“随着市民阶层财富的增长而不断上升的捐献潮流、配有贵重的雕刻祭坛和还愿匾的教堂的豪华装饰、未被授予圣职的修道士在数量和规模上的增长——这一切都是向着广度和群众性发展的虔诚需要的证明。”^②值得一提的还有到罗马和各种“圣地”进行的大规模朝圣行为以及对饱受指责的赎罪券的大规模售卖。

人们对待自己的信仰的态度是虔诚的。如果牧师不能每天按时履行自己的宗教职责，中世纪晚期的城市宗教集会（Congregation）会提出严重抗议，有时甚至要对牧师进行警告和惩罚。对于被教会宣称是实现神圣生活所必需的七项圣礼，人们十分重视，按时参加弥撒，领取圣餐，进行忏悔。在圣餐中，人们相信基督的真实临在，相信酒和面包变成了基督的血和肉。

所有迹象显示，与过往时代相比，中世纪晚期宗教上经历的并非衰退，而是一次令人瞩目的复兴。在人们日益高涨的虔诚信仰中充塞着对此生的厌弃和对获得救赎的渴望。“可以失去的东西，便不值得企盼。操操心想想那永恒的东西吧！向往天国吧！在人世间，只有那些鄙弃人世间的人才会幸福！”^③“死亡之舞”的无处不在向我们展示了这旺盛信仰中掩盖的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恐惧。这种恐惧来源于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苦难。“那是一个充满了社会骚动及农业危机，政治冲突，内战，土耳其人冷酷推进的扰攘年代：‘危机是这一时期最明显和普遍的因素’。”^④这一危机的根源只有考察近代早期欧洲社会这一大的背景后才能为我们所理解。“中世纪晚期无疑是一个变动的时代”。^⑤民族国家兴起伴随着君主权力的提升，资本主义兴起，经济变动，物价上涨，尤其是食品的价格一路飙升。人口膨胀对社会生产造成强大的压力的同时大规模地涌向城市，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最直接的结果是城市这一狭小的空间现在因充塞了如此巨大的人口而膨胀起来，超过100,000的人口从5个增加到11个；思想文化领域兴起了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研究的新浪潮，人们的思想和世界观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海外“新世界”的发现和土耳其人的不知休止的进攻；临近世纪晚期，瘟疫复起，又加梅毒的流行，农业歉收以及遍布全欧的饥荒。这一切变动的发生对社会上各个阶层人们的生活都造成强有力的冲击，而处于社会的底层的人们更是被置于苦难和死亡的边缘。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未来充满了离奇的想象，关于世界末日的种种预言日益盛行。不安和骚动孕育在社会之中，整个社会充满了剧烈的震荡。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得不到丝毫保障。“第一次，在西欧大多数国家的历史上，

^① L.W. Cowie, *Sixteenth Century Europe*, p.33.

^② 瓦尔特·彼得·福克斯：《宗教改革时代》，载于马克思·布劳巴赫等著：《德意志史·从宗教改革至专制主义结束·上》，第35页。

^③ [德]爱德华·傅克斯：《欧洲风物史·文艺复兴时代》，候焕阁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第110页。

^④ Martin D.W. Jones,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7.

^⑤ R.N. Swanson, "The pre-Reformation Church", in Andrew Pettegree ed., *The Reformation World*, p.10.

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付费警察被接受。”^① 死亡似乎近在眼前。“三分之二的儿童活不到十岁，大多数的成年人挨不到四十岁。”^② 这种生存状况自然会内化到精神层面上来，因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使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使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③人们迫切希望从宗教信仰中找到安慰和解释，从而加大了对信仰的依赖和探询。

（三）信仰中出现的新情况

对此生的厌倦增大了人们对来世的向往，从而加大了对救赎的渴望，人们在宗教上探寻的强度和烈度都获得了提升。人们在信仰上的不懈探求在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中增加了信仰中的混乱，同时遭遇到信仰模糊状态的阻隔。由此，开始酝酿出对信仰的偏离和对教会的敌视以及要求教会进行改革的呼吁。

中世纪教会的信仰远不是同质而明确的。传统上的天主教信仰只不过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一个信仰的容器。各种彼此相异甚至相互矛盾的信仰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存在的依据。在一个空间受到阻隔，人们之间缺少联系和交往的社会中，这种存在于地区之间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混乱。但在中世纪晚期，随着社会的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变动越来越大，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和密切。在实现以经济为主干的各种社会联系的同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关于宗教信仰的不同观念和实践也展开了激烈的碰撞。人口密集和流动性都很大的城市无形中成为这种思想碰撞的主要承载者。最明显表征就是崇拜的形式在数量上的无限增加，从而在提供给人们发泄宗教热情的渠道的同时，加大了信仰中的混乱和教会管理的难度。“蕴含在中世纪灵性活力中的倾向无论在数量还是在种类上是如此之多以致很难对之进行有效的归纳，其指向也是纷繁的。”^④

各种各样的崇拜形式涌现出来，在天主教的信仰仪式上造成无政府状态。圣徒崇拜获得前所未有的地位和影响。在所有圣徒中，作为基督的母亲玛利亚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崇拜对象。相应地是对其家族的神圣性挖掘，其母亲（Saint Ann）、姊妹都成为人们寻求保护的神圣性对象。无休止的对圣徒神性的探询和挖掘，无限地增加了它们的数量。米兰的安布罗斯，英格兰的圣·乔治，连圣·约瑟夫这原本带有小丑意味的滑稽形象，也日益被提升为一个善良、容忍和关爱的慈父而被寻求保护的人们顶礼膜拜。

“同时，这一信仰有时展示给我们的是极端庸俗和机械，它关注于有时被谴责为半异教的精神活动的数量并建立在似乎与异教几乎没有差别的圣礼和圣仪的多重巫

^① Peter J. Klassen, *Europe in the Reformation*, p.6.

^② Martin D.W. Jones,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6.

^③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00页。

^④ R.N. Swanson, "The pre-Reformation Church", in Andrew Pettegrec ed., *The Reformation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22.

术功能之上。”^①在旺盛的信仰崇拜下，掩盖的是人们功利性的目的，人们希望通过对特定信仰对象的崇拜获得一种保护。神秘主义盛行，一些虔诚的妇女成为其主要的承载者，菲利浦二世、查理五世，都曾求教于这种有灵性力量的妇女。信仰中异教和迷信的成份十分丰富，各种巫术和迷信思想混杂在人们的信仰中，积极而活跃。炼金术士和占星家四处活动并在各个国家得到欢迎。人们对灭世思想和救世主即将来临的预言深信不疑。这种思想不仅在一般的信徒身上体现出来，而且在教会上层和世俗贵族中也被认真地对待和讨论。发动宗教改革运动的马丁·路德和梅兰西顿（Philip Melanchthon, 1497-1560）等人就对此深信不疑，并将自己看成是上帝所派遣来对社会进行干涉，对信徒进行拯救的人。这一切对天主教信仰仪式造成不断的冲击。“尽管教会为大众的想象力提供了如此丰盛的营养，但它（原文为她，笔者按）却不能够声称要把那种想象力控制在一个健康的、基督虔诚的界限之内。”^②

人们努力在信仰中寻找一种获得救赎的确信，探询逐渐深入教义神学领域，为此加大了信仰混乱的深刻性。在复古主义成风的形势下，人们相信，越接近事物的源头，事物就显得越纯洁，信仰问题尤其如此。为此，人们加大了对教会早期神学经典和作品的研究和阐释。哲罗姆、伯纳文图拉、奥卡姆的威廉等为数众多且观点迥异的神学思想经历了“复兴”，并在彼此之间展开了对人们思想的争夺。其中，兴起于西班牙等南欧国家的托马斯主义与流行于这一时代的奥古斯丁神学之争日益凸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对《圣经》的研究和阐释。早在路德的德文版圣经问世以前，各种本地方言版本的《圣经》已经出现在各个国家。如克莱特（Colet）的英文版《圣经》，兹米尼斯·西斯内罗斯（Ximénez Cisneros）的西班牙译本《圣经》。结果，以往只是在教会上层和各大学中进行探讨的深奥的神学问题现在大规模地流行于社会上。为人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对其阐释和解释提供了可能，而民众文化水平的低下，自然导致这种解释有偏离正统信仰的可能。

在这种纷繁复杂的状况中，渴望获得救赎的人们心中充满了浮躁和焦虑。“人们普遍地对基督教产生了一种新的渴求，希望基督教能在变化了的社会条件下满足人们新的精神需求，而基督教的教义并没有适应这种变化，使人们产生了信仰危机。”^③人们将目光指向教会，希望教会能够为自己的信仰指出正确的方向。

^① R.N. Swanson, "The pre-Reformation Church", in Andrew Pettegree ed., *The Reformation World*, p.22.

^② [荷兰]约翰·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第163页。

^③ 王新中：《对欧洲中世纪天主教改革性质的理论思考》，《山西师大学报》，第99页。

二、天主教改革

长期以来，改革一词似乎成了路德所发起的新教运动的专利。对于宗教改革的理解则“特指的是由马丁·路德引发的那场最终导致信仰大分裂的那场宗教运动。”^①而天主教相应的改革行为则被看成是对中世纪原则的一种恢复和更新。天主教有没有改革？中世纪晚期大声疾呼教会“从头到脚地进行改革”的人们如何理解自己所提出的改革这一概念呢？其实，改革一词，对基督教来说并不陌生，《圣经》中对信徒的转变要求中就包含着要求信徒不断改变自己以达到理想的宗教生活的改革含义。^②从14世纪开始，流行于西欧的拉丁语改革（Reformatio），意为改善、改良、改进。根据斯克瑞伯纳等学者的研究，^③这个词在当时主要包含三重含义：意味着一部新法典或一套法律上的身份地位；可以指对大学课程的重建；在宗教上，它意味着教会的内部改革。通过对改革的分析，我们回首理解中世纪人们对教会的改革要求时，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虽然人们的态度是激烈的，甚至有时有点极端，但“从仪式到信仰，从成员到首脑”的改革要求都立足于教会所提供的框架。即教会“从头到脚的”更新，但不改变在教条、仪式或纪律方面的本质。”^④改革的目的是“纯洁教会”即教会恢复到其早期的信仰状态。

改革在基督教世界一直是被看成关乎所有信徒的大事而被积极地对待的。从康斯坦茨公会（Constance 1414-18）开始，公会议主导的教会改革一直到新教运动爆发都不曾中断过。但改革被消耗在公会议主义与教皇之间无尽的争斗中，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15世纪的社会、宗教和文化领域，人们可以感觉到一种焦虑以及对确信的一种焦急探寻，而对于这一点，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公会议主义，却没有做出回答。”^⑤第五届拉特兰公会（Lateran V, 1512-1517）上，虽然教皇获得对公会议主义者的优势，但政治性的考虑使改革依然流于形式。“再说，即使这次会议完全获得成功，无疑也没有满足中世纪末期的教民深受其苦的强烈的神圣欲望”。^⑥但公会议主义者所号召的关于对教会进行改革的思想却已经在基督教世界的信徒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他曾说：“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解体过程中，生活远远脱离了福音的纯洁性，因而教会的变革对于整个基督教世界已是必不

^① Hubert Jedin,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or Counter-Reformation?”, in David M. Luebke,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The essential readings*, Malden, Mass.: Blackwell, 1999. p.26.

^② 见 John W. O'Malley, *Trent and all that: Renaming Catholicism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p.14

^③ R. W. Scribner, *The German Reformation*,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86, p.4.

^④ Hubert Jedin,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or Counter-Reformation?”, in David M. Luebke,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The essential readings*, Malden, Mass.: Blackwell, 1999. p.26.

^⑤ Bruce Gordon, “Conciliarism in late Medieval Europe”, in Andrew Pettegree ed., *The Reformation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44

^⑥ [法]查理·斯托菲：《宗教改革1517-1564》，高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页。

可少”^① 由于“从上到下”的改革的迟缓，虔诚的信徒们开始了“自下而上”的改革。“伊拉斯摩和莫尔都试图说服教会通过恢复对《圣经》的研究来回归生活的简朴、教会组织机构的有效率、对基督福音的更高领悟。”^②

自发的改革组织相继出现。在过纯洁基督徒生活的口号下，现代虔诚运动兴起于北欧，并向外不断扩展。“在十五世纪，很少，如果有的话，那个宗教运动像“现代虔诚”运动这样受到如此热情和广泛的欢迎。”^③英国的威廉·费希尔（William Fisher），佛罗伦萨的萨沃纳罗拉等教会改革的先行者不断涌现出来。正如耶丁所说：“这不仅限于某一个国家，在整个西欧都可以找到它的踪迹。它包含了自世俗教士和宗教修会内部的所有改革努力，包括像佛罗伦萨的安托尼厄斯和帕度亚的巴罗兹，枢机大主教兹米尼斯和格拉纳达的大主教特拉维拉，埃斯塔特的乔汉·冯·埃斯和奥格斯堡的弗里德里希·冯·佐伦这些主教中的热心改革者，更不用说还有托钵修会严规派运动的奠基者们和隐修修会的改革社团。”^④

（一）新 修 会^⑤

在所有对教会进行改革的活动和行为中，修会传统的复兴最具有典型性。注重于过简朴而虔诚的宗教生活，在回归修会早期建立者虔诚信仰生活的目标下，严规派（Observant）运动兴起于中世纪晚期并得到教皇尤金纳斯四世（Eugenius VI, 1431-47）的大力支持，其影响一直持续到十六世纪末期。“修道院一个接一个实现了改组，修士和修女全都恢复了原创者所期望过的那种生活。”^⑥ 1517年发起“宗教改革”^⑦运动的路德最初就是德意志地区改组了的奥古斯丁修会的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

在旧修会大规模改组的同时，新修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新的修会组织以其对信仰的虔诚、道德生活的严谨、对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注和积极参与，成为天主教改革和复兴不竭的力量源泉和可资借鉴的典范。

新修会建立伊始就立足于教会改革之上，针对人们对教会道德风纪的指责，新修会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常被提及的神爱会（或圣爱会，The Oratory of Divine Love），1517年建立于罗马。许多教士和俗人加入这个组织，过一种虔诚的基督徒的生活。它虽然远不是一个宗教修会，但它提供的简朴、虔诚的宗教生活，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

^① [俄]德米特里·梅列日柯夫斯基：《宗教精神：路德与加尔文》，杨德友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② L.W. Cowie, *Sixteenth Century Europe*, p.44.

^③ Peter J.Klassen, *Europe in the Reformation*, p.11.

^④ Hubert Jedin,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or Counter-Reformation?”, in David M. Luebke,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The Essential Readings*, Malden, Mass.: Blackwell, 1999, p.34.

^⑤ 注：英文为：the New Religious Orders，许多书籍对这个名词的翻译有出入，如，神职班，新修会等，但所指基本相同，都是指建立与这一时期的修会组织。本文使用时基本保留原文的名词，但在同一个意义上予以使用。

^⑥ [英]托马斯·马丁·林赛：《宗教改革史》，第123页。

^⑦ 指1517年路德抨击教皇出卖赎罪券而张贴其《九十五条论纲》及由此引发的一场导致教会永久性分裂的“宗教改革”运动，他提出“圣经是唯一的信仰权威”，“唯信称义”，“凡基督徒人人可为牧师”的口号，号召信徒对教会进行改革。在这场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的许多教派在我国一般称为基督教，在学术界，一般用新教（Protestant）予以指代。

印象。“虽然圣爱会一直保持着很小的规模，但很少有哪个运动像它那样为天主教改革贡献出那么多的建设者。”^① 其中就有后来教会改革的骨干雷金纳德·波尔、卡拉法（Gian Pietro Carafa，后来的教皇保罗四世）和卡耶坦（Cajetan de Thiene）。在它的直接感召下，1524年，新型的宗教修会西廷斯（Thietines）建立起来。其成员严格遵守三大宗教誓约：绝贫、绝色、绝意。为此，第一批入会者放弃了自己的世俗财产。这个修会“建立医院、同时从事布道活动，为圣经和宗教仪式的研究提供一个中心。”^② 修会的创始人卡拉法和卡耶坦都是教会改革的积极鼓吹者，为此，“这个组织还培养了大批主教，成为罗马教会的中坚力量。”^③

类似的新修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1529年嘉布遣修会（Capuchins）；1530年，索马斯克修会（Somasch）；1530 俄尔苏林修女会（Ursuline）；1531年巴拿巴修会（Banabates）；1540 耶稣会（Jesuits）等等。受到神爱会和西廷斯的精神熏陶，早期新修会创立者之间保持着广泛而频繁的联系，分享着共同的宗教情感，存在极大的相似性。

首先，早期新修会的建立或者早于路德的新教运动，或者与其几乎同一时期进行活动，彼此之间很少发生联系。新修会最初的创建者在早期就是一个虔诚的人，或者经历了强烈的宗教转变。卡耶坦出身于维琴察显赫的贵族之家，是在意大利战争破灭了其家族在维琴察（Vicenza）的财产之后，实现了宗教转变。嘉布遣会的创始人马泰奥（Matteo de Basio, 1495-1552）是一心想效法圣·佛朗西斯，不满于方济各严规派所提供的修道生活，立志过一种更加严格苦行的虔诚基督徒生活。巴拿巴修会早期创始人之一的扎卡瑞尔（Antonio Zaccaria, 1502-47），“在其母亲的引导下，从少儿时代就显示出其虔诚。”^④ 索马斯克的创始人麦阿尼（Giromo Miani）是在成为土耳其人的俘虏后经历了宗教转变，它将他的被释放看成是圣母干预的结果。而耶稣会的创始人罗耀拉（Ignatius Loyola, 1491-1556）则是在伤病期间从《基督生平》（Life of Christ）和《圣者传奇》（Golden Legend）之类的宗教书籍中找到了自己生命的航标。奥拉特利会（Congregation of the Oratory）的创始人费利普·内瑞（Phillipo Neri）曾梦见一个火球进入怀中，而将自己看成神所赋予重任的人。而阿维拉的特丽莎（Teresa of Avila, 1515-82）则是在与神的神秘性接触中，感受到神的恩典和召唤而对所在的加尔默罗会（Carmelite）进行积极的改组。

其次，这些新修会的建立主要针对一定的社会现象，积极参加社会救济工作。“无论男女修会都努力对伴随十六世纪社会变动而出现的病患者和濒危者、贫困者、流浪者、妓女以及无家可归的儿童进行救护。”^⑤ 从西廷斯开始，新建修会都将社会慈善工作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着眼点。麦阿尼放弃政府职位，而投身于战争遗孤的教育，这与其早期从军的生涯联系紧密。而战争频繁，造成大量的遗孤也是当时意大利的一

^① Peter J. Klassen, *Europe in the Reformation*, p.202.

^② Michael A. Mullet,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p.71.

^③ 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第317页。

^④ Michael A. Mullet,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p.72.

^⑤ Robert Bireley, *The Refashioning of Catholicism 1450-1700*, p.26.

个显著的社会现象。俄尔苏林修女会主要集中于对基督教妇女的教育，在以后才没有因为特伦特公会对妇女宗教活动的限制而被禁闭于修道院的铁栅栏之内。嘉布遣修会在整个十六世纪遭受瘟疫侵袭的人们而做出的牺牲备受瞩目。“他们在罗马、那不勒斯、热那亚的医院里，照顾包括患有不可救治之症者在内的病人。”^①在“愈显主荣”和“帮助灵魂”的目标下，耶稣会成员走遍世界各地，不畏艰险，挽救了无数的“灵魂”。

新修会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都忠于罗马教会，服从教皇和教廷的指挥。他们都是教皇或教会高级神职人员的直接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受命于教皇并听命于他，“除了发绝财、绝色、绝意这些基本的宗教誓约之外，巴拿巴修会的会员还要发第四愿，那就是没有教皇的许可，不领受圣职和其他带来荣誉的职务。”^②而嘉布遣（Capuchin）修会在其第四任领导人伯纳迪奥·奥吉诺（Bernardino Ochino 1481-1564）叛逃到瑞士后，也是由于高级神职人员和意大利显贵家族如维多莉亚·科隆纳（Vittoria Colonna）的支持下才没有被解散。从教皇手中，这些新修会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豁免权。巴拿巴修会（Banabites）就从教皇保罗三世那里获得免除主教权威的特权。虽然后来特伦特公会对这种豁免权持否定的态度，要求将这些修会组织纳入主教的管辖权之下，但事实上，灵活的社会功能和复杂的社会环境，客观上要求新修会具有一定程度的组织和行动自由。是什么原因促使教会和教皇克服了建立新修会的阻力？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他们虔诚的宗教活动以及对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所树立的声望无疑对其获得教会的支持起了很大的作用。新修会的陆续增加和活动的扩大表明，他们所提供的改革范式在教会内部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并以日益加强的态势在教廷内上升，这必然会刺激教会改革的加速进行。

所有这些修会作为天主教灵性复兴产物的宗教组织中，最突出的莫过于耶稣会（the Jesuits）。“在这个团体中，神职班（笔者按：指新修会）的基本思想被推到了极端并为新的成分所丰富。”^③作为护教者、社会工作者、教育家、传教士、论辩者、忏悔师，作家等等，耶稣会对天主教的复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鉴于耶稣会在天主教与新教斗争中的巨大贡献。其创始人罗耀拉也一直被看成与加尔文、路德齐名的宗教卫士。“他是十六世纪与路德唱反调的另一个伟人，而他被天主教会封为圣徒的事实更足以说明他在那个多事之秋十六世纪中的重要性。”^④在许多学者眼中，耶稣会简直成了反宗教改革的代名词。“在致力于反对新教改革的诸多派别中，以西班牙贵族依纳爵·罗耀拉所创建的耶稣会最为猖獗。”^⑤丁建弘也说“天主教会还建立了耶稣会作为反宗教改革的最重要工具”。^⑥但耶稣会的建立几乎与新教没有任何必然联系。

罗耀拉生于西班牙巴斯克的一个中等贵族之家。青年时代沉浸于骑士理想和放荡

^① John Henderson, "Charity and welfare in early Modern Tuscany", in Ole Peter et al., *Health Care and Poor Relief in Counter-Reformation Europe*, p.58.

^② Michael A. Mullet,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p.72.

^③ [英]G. R. 埃尔顿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宗教改革》，第 378 页。

^④ Hans J. Hillerbrand, *Men and Idea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111.

^⑤ 马克垚主编：《世界历史·中古部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445 页。

^⑥ 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66 页。

的生活之中，与教会的理想相去甚远。他实现宗教转变是因其一次战役而负伤卧床期间对于宗教书籍的阅读。这发生在 1521 年前后，而此时新教运动尚处于襁褓之中。事实上，1556 年之前，没有迹象表明新教在西班牙有任何影响。在这种氛围下，对罗耀拉宗教转变起作用的只能是这个时代所提供的旺盛的宗教环境。这可以从其宗教转变的历程中找到痕迹。在蒙瑞沙（Manresa）隐修时，他的神秘主义体验和路德极为相似。和路德一样遭遇到信仰的危机的罗耀拉，一度曾想过自杀。但两人得出的结论却大不相同。路德从《圣经》和奥古斯丁神学中找到了确信，这符合路德这样一个有着丰富的神学知识的僧侣的身份；而罗耀拉只是一个经验层面的平信徒，他是从教会无形的组织中找信仰的皈依之所的。那就是对罗马教会的无条件服从。“罗耀拉的意义在于它表明，在十六世纪，天主教依然能够向人们提供精神上的抚慰和安宁。”^①

在 1522-1532 年间，罗耀拉先是辗转于赴耶路撒冷朝圣的途中，随后徘徊于西班牙、法兰西的各大学之间。这源于其效法使徒，保卫主的陵墓，使异教徒皈依的宗教理想。在巴黎大学学习期间，他受到北欧深沉的宗教氛围的熏陶。这丰富了罗耀拉的宗教知识和视界，但他对神学争论的关注远不如其对宗教实践活动的重视来的强烈。在此期间，注定要为耶稣会奠定虔诚的精神基础的《灵修》(Spiritual Exercises)已初具雏形。“他的《灵修》一书，提供的不是启迪人的心智的作品，而是使人的全部个性趋向于服从和忍耐的纲领。”^②他不断的宗教活动及其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的现实，不断受到宗教裁判所的怀疑和调查。在 1534 年，以罗耀拉为中心的六人小群体在巴黎近郊的蒙马特尔庄严宣誓：献身于主的事业，帮助灵魂，到耶路撒冷去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如果不能实现上述目标，则将自己献给圣彼得的继承人，基督在人间的代理人，罗马教皇。这里既没有出现新教的字眼也没有提到教会改革。

1537 年到达罗马后罗耀拉等人因战争而无法达成去耶路撒冷的计划，其成员逐渐涉足于意大利饱受战争和社会创伤折磨的社会中去对困难中的灵魂进行救助，并逐渐获得名声。教皇说“他们的圣地不在大卫的耶路撒冷而在彼得的罗马”，罗耀拉接受将这一团体建成一个宗教修会的建议。即基督的团体（Society of Jesus）。“耶稣会之名直到 1544 年才出现，而后主要地被加尔文及其它的批评者用为一讥讽用语；依纳爵自己从未如此地用。他死后因这个新教派的成功而失去了昔日刺痛之名称，而在 16 世纪成了荣誉之征记。”^③耶稣会成立以后就积极展开社会活动，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使纯净的基督徒生活和信仰在信徒的心灵中获得提升这一目的。这是通过公开布道和宣讲主的福音对信仰进行宣传；通过精神的训练和慈善工作，更主要的是对孩童和没有文化的人进行教育；通过听忏悔等来实现的。”^④在活动中，体现了罗耀拉“帮助心灵” (help soul) 的理想，耶稣会士积极介入世俗事务，在行动中，寻找主、追随主。“对耶稣会，罗耀拉不仅仅是想在沉思默祷和积极的行动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平衡，而

^① 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66 页。

^② Sir George Clark, *Early Modern Europe: from about 1450-1720*, p.53.

^③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信仰时代》，第 1244 页。

^④ Robert Bireley, *The Refashioning of Catholicism 1450-1700: A Reassessment of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p.32.

且他创造性地将其在耶稣会中合成为‘在行动中默祷’。”^①随着他们名声的提高，其活动范围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在社会领域中都得到了扩大。耶稣会的人数也突破了最初教皇为其设定的 60 人的规定而日益膨胀，到罗耀拉去世时已近千人。

耶稣会的诞生虽然不是为反宗教改革，“但他们兼具能力和奉献精神——而且他们总是在恰当的时机出现在恰当的地点。”^②他们组织的有效率以及他们与教皇和教廷的紧密联系，客观上使耶稣会成为天主教复兴和反宗教改革最锐利的武器。耶稣会的创立是基于为主的荣誉而战斗的原则，因此，耶稣会对主在人间的代表—教皇绝对服从。所有的耶稣会会员都要接受罗耀拉的《灵修》的培训、锻炼和神学院的教育，富有神学知识和道德。事实上，作为教皇手中工具的修会组织，耶稣会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耶稣会的服从没有严格的修道规章和外部活动受限制这两方面的制约因素，因而可以说是耶稣会的工作的多样性和可变性拓宽了其应用的潜在范围。”^③耶稣会会员免除传统的宗教仪式和活动，如不参加集体背诵日课等。因而在活动中可以因时因地灵活行动以达到目的。这成为耶稣会取得多方面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组织上，耶稣会成员划分成四个等级，最高首领为总会长，任职终身，后来教皇规定总会长任期为六年。其成员在三大誓愿之外，还要发第四愿，即对教会和总会长的绝对服从。总会长名义上拥有绝对权力，但事实上其权力受到其任命的四名“助手”的监督，并非如以往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专制的“暴君”。如果总会长存在背离信仰的行为，可以召开全体会员大会予以废黜和罢免。

在耶稣会的所有活动中最突出莫过于其在教育事业以及海外传教活动中的成功。耶稣会最初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自己的会员，但随着耶稣会在墨西拿（Messina）办学的成功，耶稣会的教育开始面向世俗。特伦特大会后，教会加大了对教育的重视，教会改革初期，各教区面临人手的不足，培养虔诚的新型教士和对民众信仰的教导都面临着困境。在各地教俗官方的邀请下，在耶稣会杰出的教育家纳戴尔（Jeronimo Nadal 1507-1580）制定的墨西拿计划（Messina Plan）（1548-1551）以及后来耶稣会制定的“教学计划”指导下，带有罗耀拉强烈的精英教育意识下，耶稣会办学活动在天主教世界内轰轰烈烈地展开。在整个欧洲来看，“1556 年以前 39 所，到 1607 年接近 300 所，在 18 世纪中期达到 669 所。”^④这些大学和学院的建立，为培养天主教世界信徒对天主教信仰的虔诚和忠诚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在罗耀拉“愈显主荣”和“帮助灵魂”思想指导下，耶稣会刚刚建立，其创建者之一方济格·沙勿略（Francis Xavier）就协同两名伙伴，到葡萄牙所属果阿（Goa）地区，开始天主教在东方的传播历程。

^① Robert Bireley, *The Refashioning of Catholicism 1450-1700: A Reassessment of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p.33.

^② Hans J. Hillerbrand, *Men and Idea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114.

^③ [英]G. R. 埃尔顿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宗教改革》，第 384 页。

^④ Michael A. Mullet,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p.95.

（二）教皇与改革

要求教会进行“从头到脚的改革”的呼声早已回响于天主教世界。当新教运动爆发后，教会面临着分裂的危险，这种要求教会改革的呼声更加强烈。人们期望的目光指向一次普世性公会，而不是教皇。要求天主教教会进行“从头到脚的改革”的呼声，久已为教会的拖延所激怒，反罗马的思想为时已久。而路德对教皇的极度不信任也表明，单凭教皇是无法解决信仰问题的。

巴塞尔（Basle, 1431-49）公会上公会议主义者与教皇尤金纳斯四世的激烈对抗留下的记忆却足够使教皇对公会议敬而远之。教皇在改革上的犹豫不决和迟缓，尤其是克莱门七世长达十几年的任期内，对改革的庸碌无为在客观上对新教的成长和传播起了助长作用，毫无疑问对教会造成了损害。但断然否定这一时期教皇对改革的重视和支持也是不符合现实的。阿德里安六世(Adrian VI, 1522-1523) 短暂的任期内，教会中充满了改革的新气象。克莱门(Clement VII, 1523-35)对来自教会组织内的改革也给予了相当有力的支持。而且他毕竟同意召开一次公会来对教会改革。没有这前期的准备，以后教会的改革是不可想象的。

教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正是改革所要消除的弊端的发源地，这不可避免地受到教廷内外利益相关者的敌视和反对，教皇是被他们所包围并选举产生的。“在罗马，机构性的对公会议主义的敌视来自于教廷的行政官员们的恐惧，他们围绕在教皇的周围，向他指出，召开一个批评性的，改革主义的、敌视教廷的公会议可能对教廷腐败的财政系统造成的威胁。”^① 阿德里安六世短暂的任期内教会改革所遇到的阻力也表明：教皇对改革态度的转变固然是教会改革的关键，但教皇的改革没有教廷高级神职人员们的支持将是怎样的艰难！

新的政治形势和新教的快速传播以及因此所造成的威胁，改变了教廷对待改革的态度。1528年的罗马浩劫^②，深深地震惊了基督教世界。这一事件被看成上帝对人间事务的干预而触动了相当一部分教会高级官员的良心。“因为所有的躯壳都变得腐败了，我们不是罗马这圣城的公民，而是巴比伦的，是腐败城的公民。”^③教皇世俗政治破产，许多教会高级神职人员实现了宗教转变。“此后，罗马教廷才真正开始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将改革问题作为自己的使命。”^④吉布提（Giberti），这位教皇政治的积极鼓吹者和执行者，毅然辞去教廷职务，返回其教区，在威罗那（Verona）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召开公会的考虑在教廷内占了上风。“即使公会议不能对教会已经失去的东西有所帮助，它至少会对那正处于失去的危险中的事物有所帮助。”^⑤

^① Michael A. Mullet,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p.32.

^② 这一年，查理的主要由德意志新教雇佣兵组成的未获军饷的军队攻占了罗马，并进行了大屠杀和抢劫。

^③ [美]威尔·杜兰著，《世界文明史·信仰时代》，第1223页。

^④ H. Outram Evennet, "Counter-Reformation Spirituality", in Luebke, M. David,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The Essential Readings*, Malden, Mass.: Blackwell, 1999, p.50.

^⑤ N.S. Davidson, *The Counter-Reformation*, p.9.

实质性的改变是从1534年保罗三世（Paul III, 1534-1549）登上教皇宝座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拉开了帷幕，因为“一个立志于改革的教皇站在所有要求改变和强化教会的最前沿。”^①虽然保罗远远谈不上是一个脱离了文艺复兴奢华的教皇，“但保罗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教皇的声望需要教皇对自己的宗教职责投以更强烈的关注。”^②这从他对教会内改革派的大力扶植；对召开公会议商讨改革问题的积极态度；对与新教和解的意愿上表现出来。

保罗三世即位后，大力提拔持有改革思想的人进入枢机主教团。“获得枢机主教职位的人现在主要从改革运动这一阶层中任命。”^③如萨多莱托（Giacomo Sadoletto 1477-1547）、卡拉法等著名的改革派领袖都进入教廷的中枢机构。威廉·费希尔等地区的改革派也得到了重视和提升。同时，对兴起于教会内部的修会运动大力扶持。1536年批准了后来与“黑袍（耶稣会）齐名的“灰发”——嘉布遣修会。1540年，批准成立耶稣会，1544年，认可了俄尔苏林（Ursulines）修女会。1536年保罗授命成立一个主要由改革派组成的委员会对教会状况进行调查，为教会改革做准备。这个委员会提交的《教会改革纲要》（Advice concerning the Reform of the Church），对教会存在的各种脱离信仰的腐败现行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教皇也遭到含蓄的指责。正如贝瑞雷所说“它证明了其起草者对教会改革态度之严肃，注定要对教会改革产生实质性的冲击。”^④

即位伊始，保罗就将其前任一直拖延的公会议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他派遣代表到各国君主那里探听关于召开公会的风声，并认真对其地点予以考虑，“在1537年，保罗优先考虑将其地点置于皮亚琴察（Piacenza）或者波伦纳（Bologna），‘属于教会，这所有教会之母，的地方’”^⑤虽然教皇依然没有摆脱公会议对教皇权威挑战的疑虑，而尽可能地想将公会议控制在自己手中，但这个教皇强烈的改革意愿却是不容怀疑的。

复杂的政治形势使召开公会议的决定一再拖延。教皇原本考虑在1536年召开的公会议由于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国瓦卢瓦家族间的战争而中断。当战争由于教皇的斡旋而以尼斯（Nice）和约的缔结而结束后，法国却拒绝参加即将来临的公会议，政治因素再一次对教会的改革造成破坏。为挽救教会的分裂，保罗三世同意与新教进行和谈。1540年，和谈在雷金斯堡（Regensburgh）举行，温和的教会改革派孔塔里尼和路德派寻求统一的梅兰西顿，是谈判的主要对象。谈判最终以破裂告终，改革问题几乎没有引起什么争议，双方对《圣经》的不同理解在事实上证明新教与天主教是行走在不同的信仰之途上的。因为在信仰的核心问题——圣餐礼上，新教坚持同体论（Consubstances）^⑥，而天主教坚信化体论（Transubstances）^⑦。

^① Peter J. Klassen, *Europe in the Reformation*, Prentice-Hall, Inc, 1979, p.211.

^② Robert Bireley, *The Refashioning of Catholicism 1450-1700: A Reassessment of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p.45.

^③ Peter J. Klassen, *Europe in the Reformation*, p.210.

^④ Robert Bireley, *The Refashioning of Catholicism 1450-1700*, p.47.

^⑤ Michael A. Mullet,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p.32.

^⑥ Consubstances:即在圣餐礼中，认为献祭时的酒和饼与基督的血和肉同在，但酒还是酒，饼还是饼。

^⑦ Transubstances:即在圣餐礼中，认为献祭时的酒和饼转变成基督的血和肉，酒不再是酒，饼不再是饼，而是基督的血和肉

情况逆转。对新教信仰本质的认识增加了教会改革的迫切性。迄今为止，天主教与新教在信仰上缺少明确的划分，在新教的冲击下，信徒们缺少防卫意识和手段。而新教是以改革教会为口号传播自己的信仰的，天主教必须净化自己才能在这场斗争中赢得信任，同时必须与新教在信仰上做出区分。为此，教会必须对自己进行改革。教皇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从而开始为召开公会而积极行动，他先后派代表奔赴各方，弥合法国瓦卢瓦王朝的纷争，必要时做出妥协。这体现在地点的选取中，教皇最终同意皇帝的要求，决定在德意志境内而靠近罗马的小城特伦特召开第十九届普世性公会。1545年，公会议终于得以召开。

教皇改革的决心和努力并没有随着保罗的去世而消减。朱利阿斯三世(Julius III, 1549-1555)和马塞卢斯二世(Marcellus II, 1555)这两个第一次公会议的主持者相继在改革派的支持下当选为教皇，继续保持对公会议的支持。朱利阿斯依据大会制定的改革法令，对兼领圣俸加以整顿，并要求主教进驻自己的教区，去担负自己的神圣职责。并重召于1549年因瘟疫流行而中断的公会。而马塞卢斯这个虔诚和苦行的教皇在其短暂的三周教皇任期内，更是时时不忘教会改革之事。这时的教会中“可以看到，在教皇的领导下，特伦特改革的法令正连续以日益提升的速度进行。”^①

罗马的改革是教会改革成功与否的逻辑起点。当1551年再次召开的公会议由于新教的军事胜利所造成的威胁而被迫中断后，1555年上任的保罗四世(Paul IV, 1555-1559)将教会改革抓到了自己的手中。与其前任们对教廷改革的犹疑和迟缓相比，保罗四世对教廷的改革是激烈而急进的。他改革了教廷，对其腐败的财政系统进行整理。建立了由60名教皇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来掌管教会的改革事宜。严格规制圣职授受，清除兼职行为；严令主教返回自己的教区，去担负自己的神圣职责；同时，严厉整肃罗马的道德和风纪。他下令关闭了罗马的所有酒店并驱逐妓女，对教士的偏离信仰行为进行严格惩戒，禁止他们跳舞和打猎。在一个深夜，他关闭了罗马的城门，派人沿街搜捕游荡的教士，将他们驱逐出罗马或关进监狱。在他主持下，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遍布罗马，宗教裁判所的牢房里关满了“异端”。禁书目录于1559年被制定出来，大规模的焚书运动开始了。对异端的憎恨和无情足以令他说：“即使我的父亲是一个异端，我也会抱来柴火烧死他”^②。神职人员信仰的正统性受到调查，波尔(Reinard Pole)、萨多来托、门罗(Morone)这样的显赫的人物也不得不为自己的信仰的正统性而辩护。保罗四世专断的统治和他敌视西班牙的政策客观上对整个教会的改革是不利的。他的改革是中心化的，在一个民族主义上升和主教们与教皇权力的关系尚未厘定的时代是很难获得贯彻的。尤其在教会面临严重危险的环境中，他对公会议的不信任和敌视是不合时宜的。但正是这位教皇开创了实质性的教会改革，为以后教皇们对教会的改革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范例。

在西班牙君主菲利普二世的支持下，改革派选出了教皇庇护四世(Pius IV, 1559-1565)。他出身比较低，是梅迪奇家族的旁支，性格宽厚温和。所有人都松了一

^① Michael A. Mullet,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p.53.

^② L. W. Cowie, *The Sixteenth Century Europe*, p.213.

口气，以为生活会由此变得宽松，但人们大失所望。虽然这个教皇的外交政策更具灵活性，但他基本继承了其前任的教会改革政策，并大力推行之，为了整顿教会的风纪，甚至绞死了一名主教。这一切说明，改革已经在教皇和教廷深深地扎下了根。这时新教掀起了新一轮的扩张热潮，加尔文教(Cavinism)事实证明比路德教(Lutheran)更具有扩张性。法国的胡格诺派（加尔文教的法国名称）于1559年在巴黎召开了第一全国规模的教士大会。面对新的情况，教皇感到天主教世界进行改革的急迫性，在西班牙的支持下，庇护五世在1562年1月18日召集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特伦特公会。正是在这位教皇的大力支持下，特伦特才得以结束了漫长的教会改革之路，于1563年胜利闭幕。在特伦特公会上，天主教改革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特伦特公会议上达成的一系列妥协结束了自15世纪开始的公会议危机。^①教皇最高宗教权威的地位得到巩固。教会面临的现实情况是教皇将改革作为自己的宗教使命，并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对特伦特公会制定的教会改革法令积极予以推行。为达到这些目的，就必须重塑教皇的宗教权威，重塑罗马作为天主教精神之源的地位，从而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改革树立典范并成为教会改革的指导中心。

与其文艺复兴先辈们沉浸于世俗的繁华不同，特伦特公会之后的继任教皇无论从个人的修养和道德上讲都是善良、虔诚的人，将信仰和教会事务作为自己的关注点。裙带关系、世俗政治、各种滥权行为虽不能说完全消失，但已不成为教皇忠诚于改革的障碍。教皇和教廷的虔诚相应地反映在罗马的社会风气之中，“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相比，现在的罗马更庄重、更遵守教规，现在的教皇一般而论生活严肃，有宗教热忱，为天主教会奋发工作。”^②“庇护（五世，Pius V, 1566-72）每天至少跪在圣体前沉思默祷两次，在降临节和四旬斋期间一样禁食，他亲自到医院探望罗马的病患者，为贫寒者洗脚，张开双臂拥抱麻风病人。”^③格里高利十三（Gregory XIII, 1572-85）被认为有着“最崇高的宗教情感”，在其子（当选前所生）的婚礼进行时，他却行走在前往教堂进行忏悔的路上。对贫寒者的关怀促使庇护五世取消了实行已久的在教皇登基仪式上向人群抛撒钱币的传统，而是将其用来对贫困者进行有计划的救济。西克斯图五世（Sixtus V, 1585-90）出身贫寒，从九岁开始就孕育在弗朗西斯修会的理想之中。在1585-86年严冬的饥荒中，他下达了控制谷物价格的赦令，以保证饥寒交迫的穷人可以买到粮食。他对渎圣行为的愤恨促使他无情地处死了两个通奸的男女修士。

教皇充分发挥宗教精神导师的功能，将整个天主教世界的精神事务置于自己最优先考虑的位置上。教皇们放弃了其前任们敌视西班牙的意大利政策，而转向一种天主教世界政策。采取一种与世俗君主合作的政策，共同对信仰进行维护。庇护五世按照特伦特公会的委托，在其任内，完成了特伦特公会委托教皇编订的天主教弥撒书、每日祈祷书、教义问答，并强制在整个天主教世界予以使用。教皇不但是天主教世界的

^① [英]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第206页。

^② [美]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孙善玲、段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481页。

^③ Michael A. Mullet,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p.113.

最高精神导师，而且是罗马教区的主教。为此，教皇必须首先树立罗马在教区改革中的模范作用，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庇护五世亲自参加节日巡行，充当信仰的表率。当赤足免冠的教皇行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时，整个天主教世界为之倾倒。天主教世界从来不曾有过这么虔诚的教皇。“庇护由此在恢复罗马基督教会理想中的城市这一漫长的计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①

教皇改革的另一个任务是重塑罗马作为天主教信仰和仪式中心的功能。教皇们不惜花大力气对罗马城进行建设。将异教的罗马在外观上和视觉上建成基督教的罗马。把罗马建成新耶路撒冷的愿望是历届教皇的目标。为此，文艺复兴时代奢靡的建筑和雕刻或被清除或被遮掩和改造，新的体现天主教改革精神的教堂、神殿、纪念碑矗立起来。为达到目的，教皇十分重视源自中世纪的“朝圣”活动。格里高利耗费了其任内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为 1575 年基督教大赦年做充分而积极的准备。届时，朝圣的人数达到 400,000。信徒来自整个基督教世界，甚至远东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活动。朝圣期间，无数的宗教信仰标志被摆上街头，宗教故事和宗教书籍被争相传颂和阅读。游行和宗教戏剧频繁演出和举行，亚当和夏娃，诺亚和早期教父哲罗姆、安布罗斯、圣奥古斯丁和圣格里高利是主要的内容。天主教信徒接受了一次系统而有效的宗教教导。通过教皇们的不懈努力，罗马为整个天主教世界的改革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并在一个更广的层次上激发了个教区神职人员的改革热情。

（三）特伦特公会与改革

1545 年 12 月 13 日，久被期盼的基督教第十九届公会在德意志境内边境小城特伦特召开。这个曾数次中断的公会最终被证明是十分成功的。“在十八年中，主教会议缓慢而稳定地对教会进行了深刻的改革。”^②“新时代的教会将是一个主教的、传教的教会在特伦特公会上被确定下来。”^③教会从中世纪以来面临的重大问题基本获得了解决。这就是通过信仰的厘定破除了信仰的模糊和混乱；固定了教会分裂的事实，开创了教派斗争的新时代；通过对教会的组织系统和成员的道德风尚进行的整肃和更新的决议“纯洁”了教会；理清了教会内部成员的责任分工，结束了教会内部的权力争夺，使教会获得稳定的组织和管理系统。

召开公会议的目的是维护教会的团结，对教会进行改革，并不仅仅是为了反对新教。召开公会解决信仰问题本是新教宣传的口号。早“在 1518 年，路德就呼吁召开一次公会，而在 1520 年左右，德意志帝国会议就通过决议支持将召开一次普世性公会作为解决宗教纷争，恢复教会和平，使教会复兴的最好方式。”^④这一呼吁在教会内部的改革派中引起共鸣，他们改革教会的思想使他们对路德持很强的同情。但随着

^① Michael A. Mullet,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p.113.

^② [法]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蔡鸿滨、王文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 165 页。

^③ John W. O' Malley, *Trent and All That: Renaming Catholicism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p.64.

^④ Hans J. Hillerbrand, *Men and Idea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92.

新教的传播和对新教性质的认识逐渐清晰化，公会反新教的色彩逐渐变浓。到保罗三世上台时，新教已经在几乎整个天主教世界遍地开花。雷根斯堡和谈的破裂杜绝了教会内妥协的倾向，“在其写给红衣主教萨多来托的那封著名的信中，加尔文明确地坦言没有悔悟的那么强烈的冲击，教会的滥权行为也可能被移除；他更进一步说，关键之处不在于教会的滥权，而是福音，那就是对基督教信仰的真正理解。”^①信仰分歧事实证明远比对教会进行改革更难以和解，而这时，教会内部的改革运动也达到高涨的顶点，他们对自己的信仰的纯洁和正统更充满自信。温和的改革派在教廷的地位逐渐为卡拉法为首的强硬的改革派所取代，反新教的强硬态度主导了教廷和教皇。对于公会议召开的目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保罗的谕令赋予它根除异端、恢复教会的统一与和平以及教会戒律与道德的改革的职责。”^②为此，在第一次公会议召开时，教皇坚持首先对信仰问题进行界定。以‘对教会的信仰与新教改革者的信仰做出明确的区分’。^③虽然在皇帝的坚持下，信仰和改革被同时进行讨论，但由于信仰问题对于宗教的重要性，从而在事实上使教皇的意志得到了彰显。

作为一次普世性公会，特伦特公会的代表性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怀疑。事实上，第一次公会召开时，确实面临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参加公会的教父人数只有 80 人，参加者几乎都是意大利的主教，法国只有两名代表，德国一名，新教也没有按皇帝所设想的那样参加公会。但随着会议的进行，无论其参加者的人数还是国家组成上都在增加。在 1551-1552 年第二次召开的公会议上，德意志的三大主教和新教的代表都参加进来。第三次会议召开时，又有法国的吉斯带领的法国代表团加入。“至少有 236 名教父参加了 7 月的会议，其中 2/3 是意大利主教。”^④闭幕式上，与会的代表更达到 256 人。在整体上看，无论其代表的人数和国家的组成上来看，特伦特都具有普世性公会所需的充分代表性。公会通过的纲领对全体天主教信徒的约束力至此具有了充分的法理依据。

反新教的基调在天主教对教义的厘定上获得充分的证明。天主教在教义上从来不够明确，神学争论贯穿于教会历史的始终。在讨论伊始，这种争论就浮出水面。但为了避免神学讨论中出现更大的混乱，争论各方放下自己的分歧，将神学讨论的重点放在了与新教有争议的部分。即围绕新教所提出的圣经、称义、恩典以及教会圣礼等问题上。“经过特伦特阐释之后，以往主导教会的在信仰上的不确定和模糊被移除了；一个自信的有着自我意识的天主教被界定出来，事情变得清晰了，天主教的地位被摆正了。”^⑤

信仰的权威是宗教得以建立的基石，也是教会证明自己在世间地位的主要依据。针对新教提出的《圣经》是信仰最高权威而敌视教会和教皇的观点，与会者首先肯定了《圣经》的信仰权威作用，但与新教宣称的“《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权威”不同，大会将基督教的传统置于与《圣经》同样的地位，因为它是代代相传的使徒所接受的

^① Hans J. Hillerbrand, *Men and Idea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73.

^② Martin D.W. Jones,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68.

^③ N.S. Davidson, *The Counter-Reformation*, p.9.

^④ R. Po-chia Hsia, *The World of Catholic Renewal 1540-1770*, p.22.

^⑤ Hans J. Hillerbrand, *Men and Idea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94.

基督的教导，从不曾中断和变质。因此，“口传圣经”与文本《圣经》同为信仰的源泉。圣经的文本依据以旧版的拉丁文版本，即圣哲罗姆的版本为准。而圣经的解释权属于教会，严禁俗人任意解释。这对于维护教会信仰的权威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也杜绝了因对圣经和经典的解释而造成的混乱状态。

称义和恩典是实现救赎的核心理论，人怎样才能获得救赎？中世纪晚期以来，对救赎的探询十分活跃。而在这个问题上，教会的教导却比较模糊。不安和烦躁不仅出现在普通信徒如罗耀拉身上，也在路德和孔塔利尼等僧侣心中引起困惑。公会议的教父们从原罪说出发，围绕新教的“唯信称义”对救赎理论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和界定。他们首先肯定了神在救赎中的始发性，人必须依靠对神的信仰所获得的恩典而得救。但同时强调通过基督的受难，人的自由意志并没有消失，人可以而且必须与神进行配合以在自己的救赎中发挥作用。这一点上，“它摇摆于泛拉丁主义或者说一方面是对人的努力的过度强调与另一方面预定论的决定性形势之间，既坚持神的主导性又坚持人的自由意志的功能。”^①这就需要通过善功来实现自己的救赎，从而为积极的宗教活动争得了在救赎中的地位。

教会的威信和存在的基础是建立在其作为信徒和神的中介地位之上的，而圣礼和圣仪是教会保持其宗教地位的重要手段。而新教对圣礼的攻击和数量的削减毫无疑问会动摇教会在信徒心中的地位。严格化圣礼在信仰中的地位自然成为教会的重要目标。为此，教会对圣礼的数量和功能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坚振礼、终傅礼、婚礼、洗礼、圣餐礼、忏悔礼、圣职礼是实现神圣生活所必需的。圣餐礼和忏悔礼受到强调。“圣礼，首先，在基督生时就被接受的忏悔和圣餐礼是恢复主的恩典最重要的媒介，没有他们，就谈不上‘人仅仅依靠信仰就可以获得神救赎的恩典’。”^②

关于圣餐和耶稣临在问题是雷金斯堡和谈破裂的诱因，在这一点上集中体现了新教与天主教对教义理解的分野。新教继承了中世纪晚期英国的威克利夫和约翰胡斯的观点，坚持同体论，就是说在圣餐中，基督的血和肉真实地临在于作为圣体的酒和面包中，酒和面包依然是酒和面包，但同时也是基督的血和肉体。这来源于路德对圣经中基督的语言的理解，因为基督说“这是我的身体”。而对于天主教来说，将酒和面包当成基督的身体和血是荒唐的。天主教认为基督真实临在于圣餐中，通过神迹，献祭中的酒和面包转化成基督的血和肉体。公会抢在新教代表到来之间通过决议，坚持化体论，反对任何其它形式的解释。至此，天主教与新教的分野被正式地固定下来。同时，公会对传统的圣徒崇拜、教会的崇拜仪式、甚至赎罪券的发行都进行了肯定，从而保证了教会信仰的正统性和继承性。“它是那样明确地对信仰进行了界定，以至于没有为路德教或加尔文派或任何其它创新者所采取的新观点（或立场）留下任何可以在信仰上导致误解和妥协的漏洞。”^③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对于信仰（神学）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新教的信仰而展开的，但通过对神学问题的有目的界定和区分，在与新教的信仰划清界限的同时，必然

^① Robert Bireley, *The Refashioning of Catholicism 1450-1700*, p.49.

^② Michael A. Mullet,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p.46.

^③ Sir George Clark, *Early modern Europe: From about 1450-1720*, p.53.

也提升了这些神学观点的地位，从而将教会内部围绕这些观点的其他解释降到比较低的层次。在这个意义上讲，特伦特对神学的界定是对中世纪信仰的一种有选择的剔除和净化，经过神学改革的教会已经不是中世纪那个教会了。“这时的天主教，与过去那种被认为是虚假的信仰形式的天主教截然不同，这就是说，它与昔日涣散无度的天主教形式有着泾渭分明的区别。”^①“它（原文为他，笔者按）也必须适应形势”^②在这一点上，它与新教处于极其相似的层次上。

对教会组织机构的改革是对中世纪“从头到脚进行改革”的呼声的回应。公会对于教会改革的讨论，涉及除教皇和教廷之外教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通过的教会改革决议有数百条之多。“这些决议，……按耶丁的话说，使特伦特成为教会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公会。”^③这些决议主要集中于解决教士职责的履行、神职人员道德、主教驻地、兼领圣职等长期困扰教会的各种弊端上。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主教权力的来源问题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与神学讨论相比，在改革的问题上的讨论进展较为顺利。即使在延续了近百年的关于主教权力的来源这个敏感问题上，也因为教会改革这一共同的目标，而在周密的策划和巧妙的外交努力下达成了默契。毋庸置疑，对信仰的忠诚和对教会进行改革的决心是造成这种状态的最主要原因。

对整个基督教世界道德风纪进行整肃的任务，现在被赋予各个教区的主教身上，公会赋予他们教区内宗教最高权威的地位。要求他们返回自己的教区，展开自己的牧养工作，对教区进行整顿，规制教区神职人员的道德，培养合格的教士。“因为教会就是主教和牧师，而符合他们职责的地方就是教区。”^④虽然在组织上，他们依然听从罗马的教诲和领导，但其宗教热情和责任感无疑受到其职责的神圣来源的激发。在教士的培养上，公会要求各主教在教区成立神学院的决定对天主教改革的影响最为深远。“即使特伦特公会没有为复兴教会作任何其它的事情，仅仅其要求为教士们开设神学院这一决议本身，它做的就已经足够多。”^⑤从此，在明确的信仰纲领指导下，各地的主教们在神圣职责的感召下，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天主教改革运动。从而加快了天主教对这个社会变动的环境的适应过程。

教会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在这次大会上得到了实现。困扰中世纪晚期教会的公会主义思想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教皇作为教会唯一的精神导师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无论会议地点的选择还是会议日程的安排都展现了教皇的意志。教皇虽然不参加公会，但可以通过自己任命的代表对其进行遥控。公会具体日程和研讨的内容由教皇任命的三位，后来是四位代表主持。公会将教廷的改革留给了教皇，它通过的制定统一的信仰文本的任务也交给了教皇。当然，世俗君主的意见不能不得到尊重，而且，在信仰的界定上，来自各大学的神学家们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要知道，“几乎从其形成的初期，各大学就赋予，或僭取了公布并解释何者为正统的宗教信仰何者为异端思想

^① [英]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第202页。

^② 张绥：《基督教会史》，上海：三联出版社，1992年，第341页。

^③ John W. O'Malley, *Trent and all that: Renaming Catholicism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p.52.

^④ John W. O'Malley, *Trent and all that: Renaming Catholicism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p.65

^⑤ Michael A. Mullet,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p.64.

的权力。”^①而代表们各自不同的身份和利益也使得这次公会不是教皇手中的驯服工具。但表决权以人数来计算，并且只属于参加会议的主教等高级神职人员，这样意大利代表的人数优势以及他们与教皇之间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保证了教皇在信仰上的独尊地位。这符合这个时代的精神，郎德（Lunt）说，“教皇权力的集中化，对于建设一个更有效率的管理机器是必不可少的。”^②许多人早就意识到这一点。罗耀拉“用他战士的敏锐目光，意识到重组天主教战线的最佳方式就是加强教皇的力量。”^③

（四）教区与改革

秉承特伦特公会上对于主教神圣职责的确认和强调，满怀热情的主教们纷纷返回自己的教区，将特伦特公会制定的教会改革法令在自己所在教区贯彻实施。长久困扰着教会的主教不驻地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返回教区的主教们首先公布特伦特改革法令，积极履行自己的牧养职责。对教区进行整顿，对神职人员进行培养，对偏离信仰的行为进行规制。在对教区的改革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可为后世楷模的主教，如法兰西的文森特·保罗（Paul of Vincent）、日内瓦的主教塞尔斯（Sales）。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米兰大主教卡洛·巴罗米奥（Carlo Borromeo）。他在其范围广大的米兰教区所进行的一系列卓有成效改革以及其本人信仰的虔诚使之成为教会改革的典范而为后世称道和效法。“其一生及其主教辖区之内，庄重在僧侣及俗人之间成为流行之品质。整个意大利可感受到他的影响，并将红衣主教由世俗之贵族转变成奉献的教士。”^④

卡洛生于没落的意大利贵族家庭，8岁剃度，21岁被授予神职，22岁成为红衣大主教，成为教皇的顾问和秘书，进入天主教权力中心。特伦特公会期间，他作为庇护四世的代表往返于特伦特和罗马之间，对公会议顺利进行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其兄长的突然逝世使他实现了宗教转变。“他写到：‘这一事件，在所有事件中，使我强烈地感知到此生的苦难，并使我强烈地意识到主的荣耀才是真正的福祉’。”^⑤从此，虽然身在繁华的罗马奢侈中心，但心灵却皈依了虔诚的信仰之门。他解散了原本众多的仆从，用一个圣徒的标准要求自己过虔诚和简朴的苦行生活。虽然家族利益的考虑要求他蓄发还俗，娶妻生子，他还是毅然选择了拥抱基督，做主的仆人，即使这也是他舅舅——庇护四世的意愿。秉承特伦特公会赋予主教的神圣职责，他毅然返回米兰，专注于推进教会的改革，维护信仰。对于已经80年没有驻地主教的米兰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在庇护四世死后，卡罗抛开家族和党派的利益争夺，用他的影响保

^① Guy Fitch Lytle, "Universities as Religious Authorities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and Reformation", in Guy Fitch Lytle, ed., *Reform and Authority: in the Medieval and Reformation Church*,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81, p.69.

^② John A. Yunck, "Economic Conservatism, Papal Finance, and the Medieval Satires on Rome", in Sylvia L. Thrupp, ed., *Changes in Medieval Society*, London: Meredith Publishing Company, 1964, p.8.

^③ Sir George Clark, *Early modern Europe: From about 1450-1720*, p.53.

^④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信仰时代》，第1225页。

^⑤ Michael A. Mullet,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p.141.

证了忠于改革的教皇庇护五世的当选。

返回米兰后，卡洛公布特伦特改革的决议，并加大力度为改革做宣传。在前改革者吉布提的助手尼科洛·澳门奈托的帮助下对教区风纪进行整顿。推广和改造了吉布提首创的忏悔模式。解散了拒绝改革的修会扈米利埃特（Humiliat）。成立了圣处女和安布罗斯修会（Oblates of the Blessed Virgin and St Ambrose）作为其改革的工具。卡斯特利奥（Castellino da Castello）的天主教教义之父（修会名）受到卡罗的重视和大力扶植，耶稣会等新修会被引进米兰。克服先天的口吃，卡罗亲自登台布道。在其长达十九年的主教任内，卡洛召集了六次教区大会，11次宗教会议。开设了三个神学院，在时间上仅晚于罗马，为了培养信徒们信仰的虔诚，他大力支持教育事业，创办学校。“到巴罗米奥去世的那一年，米兰可以自豪地宣称在其560,000的教区总人口中有740所学校，3000名教师以及40,000名学生。”^①

并不是所有主教都有卡洛那样的背景。虽然特伦特公会给与主教在其所在教区最高宗教权威的地位，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主教在教区改革中纠缠在教区内各阶层纵横交错的利益之间，步履维艰，从而使天主教改革在实际执行中，大打折扣。特伦特公会公布的改革决议能否实施，取决于当地世俗君主的态度。意大利、西班牙是最早接受特伦特决议的国家，而德意志和法兰西，则比较晚。“特伦特敕令，1583年由联盟会议作为王国法律第一次在法国公布，后于1615年又经神职人员大会最终接受。”^②“虽然有世俗政权的拖延和羁绊，但在主教和教士中依然有急进的改革者，结果，没用太久，罗马天主教就有充分的权力认为自己获得了改革。”^③

在各地主教的努力下，在中世纪晚期备受指责的神职人员道德和履行职责的能力确实得到了相当程度地提高。这是借助于传统的以及特伦特新制定的规制措施和教育的结果。主教手中的手段主要有“教区神学院培养新型的教士；教区教务大会贯彻主教的指示并收集关于教区信仰状况的信息；对教区进行视察以收集和监督教区信仰履行状况；以及教区宗教法庭对教士进行调查和惩戒。”^④主教们借助这些手段加大了对教区神职人员的整顿。主教在教区改革中加大了对世俗政权的依赖。许多世俗君主在主教履行自己职责时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如在西班牙世俗政权的支持下，借助于教士法庭和宗教裁判所，弗瑞斯奈德（Fresneda）主教对所在的库因卡（Cuenca）教区进行了大力整顿。“在1560年到1600年，在主教法庭审理的案件飙升了六倍。”^⑤在天主教改革过程中，教会罪化了长期以来未经界定而被宽容的行为，如伪誓、酗酒、赌博、打斗、嫖娼、蓄妾以及暗中进行的婚姻等。在教会的打击下，神职人员的风纪焕然一新。当然，这种结果的取得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并不是同步的。

天主教改革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全新的神职人员的出现。培养这种新型的教士加大了教会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依赖。相应的组织机构开始被建立起来，“例如（在法国）

^① R. Po-chia Hsia, *The World of Catholic Renewal 1540-1770*, p.110.

^② [法]皮埃尔·弗雷德里斯：《勒内·迪卡尔先生在他的时代》，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3页。

^③ Sir George Clark, *Early modern Europe: From about 1450-1720*, p.54.

^④ Robert Bireley, *The Refashioning of Catholicism 1450-1700*, p.116.

^⑤ Robert Bireley, *The Refashioning of Catholicism 1450-1700*, p.111.

贝吕尔红衣主教就设立了一个修士会来传授有关教士职责须知。”^① 特伦特公会之后，天主教世界掀起了兴办作为“在俗教士获得真正提高的基石”的神学院和大学的热潮。神学院和大学陆续出现于各个教区，并日益受到主教们的关注。“教皇庇护四世率先于1565年初为罗马教区开设了神学院。”^②在德意志，“为了给自己所在的教区培养教士，哥克的主教克里斯托夫（Christoph Spaur of Gurk）在1576年建立了一个小神学院。”^③神学院建立过程中得到各国君主的大力扶持。路易十四下令要求：“我们王国内的所有主教和大主教，应该立即在那些至今一所神学院也没有的教区建立起神学院。”^④在君主的支持下，到1760年左右，法国已经有153个神学院。但从整个天主教世界的范围来看，由于财政和人手的不足，最初神学院的效果不甚显著。由于各修会，尤其是耶稣会，在教育方面的成功，各教区多将教育事业交到他们手中。在1773年以前“耶稣会垄断着西班牙的教育并且也几乎垄断了法国的教育。”^⑤

但神学院的长期效果却是很明显的，“这方面的工作缓慢地产生了效果。”^⑥经过神学院教育和培养的新型教士逐渐出现于天主教世界。在神学院和各级学校的教育中，宗教知识的讲授一般都接受经过罗马严格界定并认可的宗教文本：罗马教义问答，罗马的每日祈祷书，罗马的弥撒书等。这种经过神学院熏陶的教士，执行罗马的指令，忠实于自己的信仰和职责。充满了自律精神。不公开饮酒，不参加狩猎，远离暴饮暴食以及粗鲁的乡邻，身着法衣，蓄短发，成为“一个信仰虔诚的榜样，一个对自己职责的召唤投以细致入微的关注的护教者。”^⑦这些教士居住在自己的教区，有时达数十年之久。“到1672-73年，在巴黎大主教区的138名神职人员中，登记记录的未驻地的只有6名。”^⑧在德意志的斯皮耶尔（Speyer）地区，“到1620年，大多数教士达到了特伦特大会所要求的教士应达到的标准。”^⑨教士的报酬逐渐增高，收入变得比较稳定。“例如，在乡村教区提尔特（Tiet），在1622-1682年间，教士的收入增加了40%。”^⑩因此，教士索要钱财现象逐渐减少，即使有也是偶然的、个别人的行为。不道德行为逐渐减少，蓄妾现象也得到很好的控制。在斯皮耶尔，“到1520年，几乎所有的教士都是独身”。¹¹ 为避免腐化堕落现象的滋生，教士不允许在出生地接受神职。天主教改革对于神职人员的整肃至此获得了成功。

^① [法]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第192页。

^② [英]R.B.沃纳姆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反宗教改革与价格革命》，第83页。

^③ Regina Portner, *The Counter-Reformation in Central Europe Styria 1580-1630*, p.193.

^④ Michael A. Mullet,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p.157.

^⑤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二卷》，第14页。

^⑥ [英]R.B.沃纳姆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反宗教改革与价格革命》，第83页。

^⑦ Michael A. Mullet,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p.159.

^⑧ N.S. Davidson, *The Counter-Reformation*, p.30.

^⑨ Marc R Forster, *The Counter-Reformation in the villages: Religion and Reform in the Bishopric of Speyer 1560-172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59.

^⑩ Michael A. Mullet,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p.119.

¹¹ Marc R. Forster, *The Counter-Reformation in the villages: Religion and Reform in the Bishopric of Speyer 1560-1720*, p.59.

三、天主教复兴

(一) 天主教改革与民众信仰

天主教改革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中世纪晚期出现于基督教世界的旺盛的信仰需求与教会教导缺乏明确性之间形成了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的释放，已经对天主教会的完整性造成了破坏。这就是马丁·路德所肇始的新教运动。在特伦特公会上，通过对信仰的界定，天主教会有了一个明确的信仰纲领。将特伦特形成的信仰纲领贯彻到广大基督教信徒中去，以破除民众中信仰的混乱状态，是教会立足于这个社会的必要条件。为此，在教会整顿内部纪律和道德的同时，一场在民众中贯彻特伦特信纲的运动也拉开了帷幕。

当教会将目光转向所谓“民众信仰”之中时，民众中存在的对信仰的无知令教会内虔诚的教徒感到震惊。毫无疑问，这一信仰的主体是基督教的。但这种基督教信仰很难说是基于对基督教教义有着明确的了解和清楚地感知的有自觉意识的信仰。许多信徒之成为“基督教教徒”，仅仅因为这是父辈和祖先们所信奉的信仰，于是不言而喻地在后代身上得到延续。人们似乎从来不曾想过去追问，自己所继承来的信仰具有哪些真实的本质。

民众对天主教信仰的无知为各种异教思想和迷信思想的滋生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如在德意志，“病人都被送往温米尔贝格修道院附近一些地方，他们那里可以清楚地听到修道院的钟声，人们都相信这钟声能够治愈疾病。”^① 各种有关神迹的书籍和思想流传在社会之中，引起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无限遐想。“他们显示出一种对不寻常事物的偏爱：妖魔所生，彗星预言以及不明物体间的无形斗争。”^② 民众这种多样性和功利性的信仰对天主教的信仰造成潜在的威胁。因为“大众信仰试图使精神世界降为物质世界利益的附属品；相反，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的改革者们，都是要将精神世界置于物质世界之上。”^③从这个意义上讲，天主教改革面临着一次对信徒进行“重新基督教化”的艰巨任务。

“重新基督教化”就是用经过特伦特重新界定的天主教信仰对存在于民众信仰中的异教成份和迷信思想予以剔除，改变对天主教信仰的无知状况。在一个充满了教派斗争的时代，对信徒进行教导，增强其对自己所属宗教的认知，并形成自我意识，对于保持并增强天主教信仰在教派争斗中的地位也是十分现实的。在这个意义上讲，“重新基督教化”也具有与新教斗争的性质。为此，强制信徒参加本教派的仪式，加大对

^① [英]托马斯·马丁·林赛：《宗教改革史》，第114页。

^② H. G. Koenigsberger & George L. Mosse,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 General History of Europe*, p.169.

^③ N.S. Davidson, *The Counter-Reformation*, p.68.

信徒信仰履行的监管力度就成为必需。异教的神职人员和教师被撤离原有的岗位，相应的属于本教派的人员被安插进来，对于拒绝接受本教派信仰的教徒，大规模的驱逐和迫害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宗教改革后的两百年，一道文化鸿沟在天主教与新教之间形成，这一鸿沟，正弗朗斯（Francóis）所说，展现在两者在社会、经济的不同之上。”^①

天主教的丰富的仪式体系在塑造天主教信徒的身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各种宗教仪式的参加不仅可以培养信徒对宗教的虔诚，也在无形中将这种虔诚限定于天主教提供的信仰框架之中，从而提升信徒对天主教信仰的明确感知。为此，教会加大了对圣礼和圣仪的强调。圣礼和圣仪被频繁地举行。尤其是圣餐礼，更为教会所重视。因为圣餐礼直接与救赎连在一起，长期以来就是信徒最热衷于追求的圣礼。

教义教导是“重新基督教化”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因为“对民众信仰的无知状态的日益加深的感知伴随着这样一种日益提升的意识，那就是实现救赎所必需的不仅仅是对教会教导的一般意义上的认可，而是对信仰知识的明确认知。”^②为此，各种能够增进信徒对宗教知识进行了解和学习的方式被教会所采用。教义问答、弥撒书、祈祷书被整理出来，在教士的鼓励和催促下，为信徒所阅读。布道频繁地举行，培养民众信仰的“舞台剧”被创设出来，在民间巡回演出。各种兄弟会组织被建立起来以宣传和培养天主教信仰，如巴黎的“虔诚教友会”就是其中影响很大的一个。

增进信徒对信仰知识的了解，客观上要求天主教加大对印刷出版业的利用和控制。早在新教改革之初，路德就借助于印刷技术成功地传播了自己的宗教改革思想。现在，天主教也加大了对印刷出版的重视和利用。各地的主教和教士将自己所写的教义问答，宗教故事或者关于神学争论的论文送到印刷所进行刊印，并以小册子的形式印行出来，流传到信徒中间。如罗耀拉的《灵修》和弗朗索瓦·德·萨尔的《虔诚生活入门》在法国广为传布。有的主教甚至在自己的教区建立印刷所，作为自己宣传宗教思想和改革思想工具。卡洛在赴米兰教区后，就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印刷所，为自己在教区的改革作宣传。对印刷技术的利用，增加了信仰方面的书籍在文化作品中的比例。“在十八世纪的前四十年里，法兰西出版的书籍中三分之一是以宗教为其主题的。”^③从而，对宗教知识的普及和提高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了适应民众在文化上的低下状态，各种信仰书籍尽可能采用通俗易懂的形式，一般不涉及那些比较艰深的神学和复杂的教义。同时，视觉和听觉形式的教导方式被发明出来，以帮助不识字者提高对信仰的虔诚。

将本属于道德良心的信仰问题在世俗的层面上被“罪化”是“基督教化”的一个鲜明的特色。这就要求教会加大对社会的规制，各个教区成为社会控制的基本细胞。按时参加教会的信仰活动成为人们的一项社会义务和责任。“神学家，神甫，牧师，教师，医生，接生婆，有时甚至包括世俗官员们统统要接受有关其信仰正统性的检查

^① Marc R Forster, *The Counter-Reformation in the villages*, p.228.

^② Robert Bireley, *The Refashioning of Catholicism 1450-1700*, p.102.

^③ Michael A. Mullet,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p.163.

并要对各自信仰进行宣誓。”^①与教会教导不相吻合的神学思想和迷信活动则受到无情的打击和遏制。神秘主义受到怀疑和遏制，对女巫迫害的盛行就体现了这一点。“社会和文化控制的另一种方式是宗教裁判所的禁书政策”^②不利于教会教导的思想和书籍受到审查，或者需要修改，或者被付之一炬。其作者也受到调查和惩处。但这个任务对于教会来说未免过于庞大，教会本身没有足够的力量，必须借助于君主的力量。而君主也乐于参加进来。因为君主“清楚地意识到，强有力的教会机构能够加强他们的力量。”^③“宗教裁判所成为重要的社会规制工具。其管辖范围也逐渐扩展。裁判者之管辖范围延伸到亵渎上帝，买卖圣职、鸡奸、一夫多妻、强奸、淫媒，违反教会规律的斋戒，和许多其他的与异端无关之作为。”^④这种对君主的依赖逐渐使教会丧失了独立性，使教会在事实上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而教会和世俗的结合，使习惯于社会同质和规制措施的信徒客观上成为近代国家所需要的忠顺的臣民。

对信徒进行教育的重要性促使天主教和新教各派都将教育看成关乎本教派未来命运的大事，从而双方都加大了对教育事业的扶植。“很少有哪次历史性的运动能够像天主教改革与新教改革这样对待教育的态度如此严肃。”^⑤对青少年的教育受到更高的重视。因为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都认为，“年轻人更具有可塑性，因此更容易被塑造。”^⑥由此，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掀起了建立学校、推广教育的狂潮。“仅仅在神圣罗马帝国，在十六和十七世纪就建立了 12 所天主教的、12 所路德教的和 8 所加尔文教的大学或类似的机构，如果我们将瑞士计算在内的话，还可以为加尔文教再加上 5 所。”^⑦这客观上有利于提高近代欧洲社会的文化水平，从而为以后科学技术上的革新打下了基础。伽利略、笛卡尔、牛顿都在这个时代的教育普及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中获益匪浅。

在所有从事教育事业中的组织中，耶稣会所办学校给人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在免费的口号下，他们所创办的学院和学校的数额直线上升。“到 1600 年，已经有 236 所学院。在意大利和西西里有 56 所；葡萄牙及其殖民地 21 所；西班牙和西班牙的新世界 77 所，其中 15 所在墨西哥和秘鲁；其它 82 所在西欧和中欧的其它部分，其中 21 所在法兰西，1630 年仅仅在法国耶稣会学校中接受教育的人数估计就在 25,000 到 40,000 之间。”^⑧

这些教育事业的首要目的是增强学生对天主教的信仰，为此，神学和相应的宗教知识排满了各大学的课程表。但很难说，这种教育对科学探索精神的破坏达到怎样的程度。新教的大学中，信仰知识同样占有相当高的比例。随着对教育事业的关注的加深，对教育的投入也不断增加，教育的范围也不断扩展到世俗领域。为了吸引更多的

^① Wolfgang Reinhard, "Reformation, Counter-Reformation, and Early Modern States: A Reassessment", in David M. Luebke,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The Essential Reading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9, p.116.

^② T. W. Gillian Ahlgren, *Teresa of Avila and the politics of sanctity*, p.15.

^③ Doyle William, *The Old Europe order 1660-18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52.

^④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信仰时代》，第 1260-1 页。

^⑤ Robert Bireley, *The Refashioning of Catholicism 1450-1700*, p.121.

^⑥ Robert Bireley, *The Refashioning of Catholicism 1450-1700*, p.121.

^⑦ Wolfgang Reinhard, "Reformation, Counter-Reformation, and Early Modern States: A Reassessment", in David M. Luebke,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The Essential Readings*, p.121.

^⑧ Robert Bireley, *The Refashioning of Catholicism 1450-1700*, p.127.

学生进入教派所办学校，各个教派都加大了对非信仰方面知识的课程设置，而耶稣会的免费教育在这方面的成就是新教各派所无法比拟的。新教培养出了牛顿、开普勒，天主教也培养出了笛卡儿、伽利略！但无论如何，这种教育对天主教信仰的普及和提高所做的贡献都是引人注目的。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保留的库安卡教区的记录显示，在1580年到1589年之间，那些出席宗教裁判所的人中，无论男女，百分之八十可以背诵教会的基本祈祷词。”^①

在天主教的“基督教化”运动的冲击下。民众中存在的所谓“大众信仰”被压缩到微小的层面和程度。“在巴黎，大众信仰被挤压到虔诚的文学作品这一层面之下。”^②这个过程自然受到“大众信仰的”强有力抵制。这是因为：“大众信仰源自于当代的经济与社会状况，特别是在农业地区就更是如此。”^③在一个很深的层次上，这种大众信仰与民众的社区观念是同一的。任何企图改变这一信仰形式的行为都会被看成对这种社区组织和生活的破坏而遭遇到人们的顽强抵抗。而“事实证明，说服教区所有的人定期到教堂集会，或者在复活节一起举行圣餐礼，完全超出了教士的能力。”^④此外，天主教的宗教理想是在传统基础上对基督教信仰的提取和凝结，他剥离了中世纪晚期的基督教信仰中原有的丰富内涵，这种“新”的宗教理想与人们传统的宗教实践之间产生了不小的差距，要人们接受这一信仰，需要教会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这一过程需要几代、几十代的岁月。在这一点上，新教和天主教面临同样的问题。“在民众层面上，这两种信仰的仪式与传统风俗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来自地区的保守主义思想在减缓了新教改革的进程的同时，也减缓了天主教改革的进程”^⑤虽然如此，天主教改革在民众中依然深深地扎下了根。“但总的来说，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努力，特伦特公会模糊的赦令在这一方面已经在一个相当深的程度上获得了成功则是很明显的。”^⑥

经过教会的改造，在天主教世界，文艺复兴的奢华逐渐褪去，人们又变得虔诚而庄重。“佛罗伦萨市民对一切健壮的仪表堂堂的人的喜爱已经过去，人们又看中一个人是否虔诚，是否愿意为教会服务。上层社会人士不再穿彩色、华丽的衣服，几乎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像修士，都穿戴轮状绉领的严肃、紧身的衣服。”^⑦

（二）天主教“反宗教改革”

事实上，天主教与新教的斗争远远早于我们对“反宗教改革”的理解。瓦尔特·蔡

^① Robert Bireley, *The Refashioning of Catholicism 1450-1700*, p.104.

^② Michael A. Mullet,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p.163.

^③ Davidson, N.S., *The Counter-Reformation*, p68.

^④ John Bossy,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the People of Catholic Europe", in David, M. Luebke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The Essential Readings*, p. 90.

^⑤ H. G. Koenigsberger and George L. Mosse,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170.

^⑥ John. Bossy,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the People of Catholic Europe", in David, M. Luebke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The Essential Readings*, p.101.

^⑦ [英]恩·贡布里希：《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从远古到现代》，张荣昌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页。

登正确地说“被理解为旨在保持和改组天主教的政治斗争的反宗教改革，在时间上部分在 1555 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之前约三十年即已进行（1521 年沃尔姆斯谕令，1530—1531 年瑞士卡尔佩战争）。”^①只是这一斗争此时还没有成为教会的一种有组织、有意识的系统性行为。从 1542 年开始，这一系统的与新教进行有意识的战斗的行为开始了。明显的，这种战斗在最初具有相当强的防御性。天主教这一古老的信仰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对手在事实上证明远比其最初想象的要强大和有力量。

在 1541 年的雷根斯堡和谈破裂之前，在教会内存在很强的与新教和解的倾向。“红衣主教卡耶坦，一个多米尼克派的伟大的神学家，判断他（路德，笔者按）犯的是误解之罪，而不是异端之罪。”^②这种观点在人文主义者中同样有着广泛的市场。“这是由伊拉斯谟作为精神领导的人们，那时正值其影响力的顶峰。他曾鼓励选侯弗里德里希为路德提供保护，而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早期，他积极努力‘去平息激烈的争论之火’。”^③

教义上的混乱以及教会内妥协派和强硬派的争斗，模糊了天主教的视线，天主教信徒在新教进攻面前缺乏有效的防卫手段。这助长了新教的快速传播。到雷堡和谈破裂时，新教已经扩散到意大利的各个地区。威尼斯、帕度亚、非拉拉、皮亚琴察，整个意大利北部处于被新教吞噬的危险之中。持新教思想的人越来越多。“非拉拉的第一夫人是热衷的新教徒。”^④加尔文曾受到他的盛情邀请和接待，时间是在 1536 年。“卢卡的奥古斯丁教团的修道院副院长彼得·韦尔米格宣传新教思想，‘他是路德教外的路德’”^⑤所有迹象似乎都在显示，整个天主教世界沦入新教手中只是时间的问题！

教会开始了战斗。雷根斯堡和谈的第二年，久被拖延的重建罗马宗教裁判所的建议被采纳，在枢机主教卡拉法的积极活动下，罗马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一样展开了积极的镇压异端的活动。信徒信仰的正统性受到调查，意大利和西班牙弥散着一股浓重的严苛之风。持异端思想者遭到监禁、罚没财产、甚至处以火刑的惩罚。“在（西班牙，笔者按）宗教裁判所最疯狂的 18 年中，11、4 万人被指控，10,220 人被处以火刑。”^⑥接受调查的不仅仅是一般信徒，西班牙大主教卡兰扎（Caranza）这个特伦特公会的参与者，因被怀疑持有新教思想，而在宗教裁判所的牢房里被关了 17 年。波尔仅仅因为英格兰的玛丽女王的保护才幸免于这样的命运。宗教裁判所对教会以外的宗教活动充满了不信任，罗耀拉和阿维拉的特丽莎都曾因为积极的教会外的宗教活动而受到宗教裁判所法官的盘查。为了禁绝新教异端的渗透，加大了对书籍出版的监管。

“在一个出版业已经成为导致思想混乱的最可怕的工具的时代，书报审查制度是极为重要的一种战略。”^⑦制定书报审查制度的目的是，“罗马试图通过控制文化这样的防卫性措施与异教徒进行对抗，这种文化有可能会将无知的信徒暴露在异教思想的感染

^① 瓦尔特·蔡登：《信仰斗争时代》，载马克思布劳巴赫主编：《德意志史·从宗教改革至专制主义结束·上》第 166 页。

^② Martin, D.W. Jones, *The Counter-Reformatio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61.

^③ Martin, D.W. Jones, *The Counter-Reformatio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61.

^④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信仰时代》，第 1218 页。

^⑤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信仰时代》，第 1219 页。

^⑥ 张文建：《天国之道——基督教》，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年，第 138 页。

^⑦ T. W. Gillian Ahlgren, *Teresa of Avila and the Politics of Sanctity*, p.15.

之下。”^① 1559年，在教皇保罗四世的直接参与下，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公布了以严苛著称的罗马《禁书目录》(The Index of Prohibited Books)。焚书运动在天主教所属国家和地区轰轰烈烈地展开。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新教徒纷纷逃亡到新教地区，伯纳迪奥·奥吉诺之叛逃日内瓦只是其中之一。但毫无疑问的是，在这种严苛的打击之下，新教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逐渐被排除出去。

教会的目标是将所有丢失给“异端”、“叛教者”的信徒重新领回“真正”的信仰中来。从而在整个欧洲与新教展开了争夺。“和解的希望看起来是越来越遥不可及，结果是各个对抗的阵营纷纷将自己教派的生存建立在彻底扑灭他们对手的基础上。”^② 在这过程中，教会是通过与各世俗君主结盟来实现的。凡是得到世俗政权帮助的地方，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都获得了胜利。反之亦然。当然，这一合作并不总是愉快的。

在法国，新教势力的发展引起王室的警觉是在“海报事件”之后，从此世俗政权开始了对新教的镇压，“1540年颁布惩治异端条例，1549年设立专门惩治加尔文教徒的法庭，3年之间有5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人被处死。”^③但法国对待新教徒的政策缺乏连贯性，瓦卢瓦王朝(The Houses of Valois)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The Houses of Habsburg)的争霸战争需要借助于德意志新教诸侯的力量，为此，法国在对待新教的问题上，态度一度很暧昧。由于加尔文是法国人，日内瓦在地理上接近法国，新教在法国成长很快。1559年，新教徒在巴黎召开的全国教务会议引起了天主教徒的恐慌。在强大的吉斯(Henri De Lorraine Guise)家族的支持下，天主教贵族向南方的新教势力发动了进攻，法国开始了称为“宗教战争”的内战。在特伦特公会后，天主教经过改革力量增强，在与新教斗争中更加自信和不宽容。在1572年8月24日天主教对胡格诺派发动了“巴托罗缪大屠杀”。1576年，北部天主教贵族成立了天主教联盟，与法国的世仇西班牙结成了联盟，共同对胡格诺派作战。在战争后期，当君主站在新教徒一边时，天主教徒“为了保卫他们的信仰与他们的教皇，抵抗理论以及人民主权思想，特别是在一些西班牙耶稣会士那里，比加尔文在任何时候曾经提出过的思想走得更远。”^④对王权近乎迷信般崇拜的法国，接受亨利四世(Henry IV, 1589-1610)这个法定的国王必须以其改宗天主教信仰为条件，经过改革的天主教信仰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为了巴黎，是值得做弥撒的”，亨利四世改宗天主教，确立了天主教在法兰西的地位的恢复。“1615年以来，自人心深处萌发出来的天主教复兴运动已经重新部分地控制了文明社会。”^⑤到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南特赦令”，天主教在法国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由于《奥格斯堡合约》的签订，新教在德意志的扩张受到限制。“在天主教德国的许多部分，事实上，在整个天主教欧洲反宗教改革是以将新教信徒们转变成天主教

^① Peter J. Klassen, *Europe in the Reformation*, p.227.

^② Peter J. Klassen, *Europe in the Reformation*, p.221.

^③ 田垣：《巴托罗缪之夜—法国历史上的一桩宗教惨案》，《世界宗教文化》，1998年第1期，第52页。

^④ Wolfgang Reinhard, "Reformation, Counter-Reformation, and Early Modern States: A Reassessment", in David M. Luebke,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The Essential Readings*, p.111.

^⑤ [法]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第198页。

徒的努力开始的。”^①这方面，耶稣会的活动最有成效。在罗马的德国学院培养出一批批地传教士，并将他们输送到德意志进行活动。在耶稣会士的教导和说服下，大批新教徒回到天主教的怀抱。“1564年3月，一名教区神父马丁·艾森格赖因写信给耶稣会会长莱奈茨。感谢耶稣会在德意志所做的工作，他本人由此重新皈依了天主教。”^②当1582年，科隆大主教格布拉德·特伦布塞斯，因婚姻问题改奉新教的危急时刻，由杰出的耶稣会士加尼修斯领导的强有力的抵制运动，将这一关键地区留在了天主教内。天主教在德意志的活动得到信奉天主教的世俗君主的大力支持。如皇帝费尔南德二世，巴伐利亚的历任选候。其中有许多君主都曾曾是耶稣会所办学院的学生。“在反宗教改革的强大攻势下，新教开始收缩，“德国新教势力范围的扩大约在1566年达到高潮，此后便开始转入低潮。”^③在后来的三十年战争中，新教也同样遭到失败。许多地区回到了天主教怀抱。1629年，教皇颁发“归还教产赦令”。“虽然以后几年内发生的事件使赦令未能全部实施，但仍有5个主教区、一百座隐修院及数百座教区教堂一时被移交。”^④天主教在德意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耶稣会的活动在波兰也取得了成效。由于耶稣会得到波兰国王约翰·西吉斯蒙德(Sigismund II, 1548-1572)的信任和支持，耶稣会的学院和学校在波兰陆续出现。这些学院和学校培养出大批虔诚的天主教徒，其中许多学生是波兰显赫家族的成员，从而保证了这个宗教改革时代信仰最宽容的国家皈依天主教信仰。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力度不断增强，成效日益显著。“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形势日渐对新教不利；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耶稣会通过宣传争取到许多人改宗，天主教会这时咄咄逼人，对最后胜利信心十足。”^⑤在尼德兰，菲利普二世虽然没有将叛乱镇压下去，但他将南部十三个州留在了天主教信仰之中。

在英国，天主教的玛丽(Mary I, 1553-1558)登上英格兰的王位为教会恢复英格兰的地位提供了契机。声名显赫的波尔被教皇派往英国，辅佐玛丽对天主教的恢复。天主教流亡者纷纷返回英格兰，迫害开始了，这与过去时代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角色变换了，现在是新教徒遭到迫害。这一趋势在玛丽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1556-1598)结婚后进一步加强，“婚后玛丽加快速度致力于在英国恢复天主教，大部分同情改革的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被陆续撤职，一些虔诚的新教徒开始逃往国外。”^⑥新教的经典和仪式被废止，新教代表和主要活动家遭到逮捕、监禁、火刑的对待。“1555年六月在牛津发生了活活烧死新教主教拉蒂默和里德利的著名事件。”^⑦但波尔和玛丽的去世，破灭了教会的希望和努力，新即位的女王伊丽莎白(Elizabeth I, 1558-1603)支持新教。并恢复了新教的崇拜仪式。作为回应，教皇革除了伊丽莎白的教籍，解除其臣民对他的效忠。教会的希望寄托于苏格兰的玛丽(Mary Stuart, 1542-1587)。“玛

^① Marc R Forster, *The Counter-Reformation in the Villages: Religion and Reform in the Bishopric of Speyer 1560-1720*, p.144.

^② [英]R. B. 沃纳姆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反宗教改革与价格革命》（第三卷），第75页。

^③ [美]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第496页。

^④ [美]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第499页。

^⑤ [美]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第497页。

^⑥ 蔡骥：《英国宗教改革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1页。

^⑦ [英]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薛力敏、林林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版，第527页。

丽·斯图亚特作为英格兰王位合法的天主教继承人的身分使其在英格兰囚禁期间成为整个欧洲范围内天主教阴谋的名义上的领袖。”^① 天主教策划了对伊丽莎白的谋杀，并建立了罗马学院的英格兰学院，为英格兰培养传教士。“1580年12月时，100多名教士登陆。”^②为了迫使英格兰重回天主教，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出动了“无敌舰队”。政治考虑与宗教考虑交织在一起，因为“如果英格兰被征服，他将在那里重建天主教和确立自己的统治权，平定尼德兰的叛乱也将有希望。”^③

经过特伦特改革后的教会，重新焕发出青春和活力。在与新教的斗争中，逐渐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这个教会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在新教进攻面前软弱无力的教会，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也不再是中世纪晚期那个信仰中无所不包的教会。“虽然天主教会在僧侣等级制度、权力结构、圣礼和教义方面保持与其初期的连续性，但是它经过宗教改革和特伦特宗教会议之后已经不再是中世纪的教会了。它变成更为有力的传教布道的教会，同时由于信仰分裂也变成战斗的教会（同时，由于强调反新教的立场而在许多方面变得狭隘了）。”^④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使用武力和高压绝不是天主教的专利。“在加尔文当日内瓦统治者的头四年里，至少有五十八人被判处死刑，而人口总数只有一万六千人。”^⑤这是一个因信仰虔诚而变得极端不宽容的时代。维护自己的信仰，惩治所谓的“异端”，在各个教派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天主教所使用的手段和措施，在新教方面大多能够找到相应的对应物。“日内瓦的天主教徒是不许结婚的；大多数荷兰城市禁止天主教徒公开做礼拜；天主教教士若在英国做法事可判处死刑。当时欧洲的正常思想状况是‘不宽容’”^⑥只是，与十六世纪上半期不同的是，现在是新教对天主教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感到恐惧。当边界固定下来，任何一方都无法将另一方消灭成为事实。天主教和新教一样开始了所谓的信纲主义形成过程，即塑造自己教派的成员身份，加大对社会的规制。这一过程是与对民众信仰的重新基督教化同步进行的。“信纲主义使宗教和政治固定化和中心化，这导致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也导致新教各个教派之间充满了矛盾和冲突。”^⑦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一样的，天主教也不得不接受与新教共存的事实，而变得相对地宽容一些。

（三）天主教与海外世界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拉开了天主教全球化的序幕。“新大陆”的发现唤醒了对使徒时代的狂热想象和崇拜，弥赛亚思想日益流行，到海外传教在教会内部引起强烈反响。《福音》要求信徒将信仰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天主教所立足的西欧本身就

^① Susan Doran, *England and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68.

^② [英]肯尼斯·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版，第293页。

^③ [美]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第491页。

^④ 瓦尔特·蔡登：《信仰斗争时代》，载马克思·布劳巴赫等著：《德意志史·从宗教改革至专制主义结束·上》，第268页。

^⑤ [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二卷》，第204页。

^⑥ [法]皮埃尔·弗雷德里：《勒内·迪卡尔先生在他的时代》，第27页。

^⑦ Bodo Nischan, "Germany after 1550", in Andrew Pettegree ed., *The Reformation World*, p.387.

是使徒传教的结果。在传播主的福音到全世界的宗教理想的感召下，如何将基督教信仰传遍这未知的“新世界”是天主教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伴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亚、非、拉的扩张和殖民活动，海外传教活动得到这两个国家君主的大力支持。修会组织是这一运动的先锋和开拓者，传统的弗朗西斯修会、方济各修会、奥古斯丁修会的活动最突出。最初，海外传教活动的空间主要在美洲。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海外殖民地的扩大，加大了对海外传教的要求，新的修会组织陆续加入到海外传教的行列。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耶稣会。在其成立的第二年，即 1541 年，耶稣会的创建者之一，方济各·沙勿略就和两个伙伴踏上了到东方传播基督教的征程。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耶稣会几乎垄断了天主教在东方的传教活动。以果阿为据点，在印度、菲律宾、印度支那、中国、日本都有耶稣会活跃的身影。

欧洲基督教内的教派斗争也将海外传教提升到新的高度。随着新教运动的壮大，和解被证明不可能，斗争成为现实的考虑。天主教内充满了对新世界传教的渴望，因为他们将新大陆的发现看成上帝对人间事务的干预的结果，是对新教异端和伊斯兰异教徒给天主教世界所造成的损失的一种补偿。当然，在新教尚未对这片土地产生非分之想之前，将其归入天主教世界的急迫感也是教会积极支持海外传教活动的一个重要考虑。

传教士将自己想象成基督教早期的使徒，来向野蛮的落后地区传播救赎的希望，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与之相伴的是对传教地区原有的宗教习俗的蔑视和拒斥。在美洲，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的宗教习俗受到传教士的野蛮摧残。传教士认为他们以活人祭奠神灵的做法是“魔鬼”的信仰，将他们的宗教文化典籍焚烧殆尽，对美洲土著文化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在印度，情况在最初也没有什么不同，“对印度的主流信仰印度教，沙勿略毫无尊重，相反，他还从里斯本获取了禁止‘果阿岛异教徒迷信活动’的命令，获得了挨门逐户搜查印度教偶像的权利”^①。

欧洲本土旺盛的宗教热情在海外进行传教者身上烙下了鲜明的印记。在海外进行传教的活动最初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成分。在最初对阿兹特克人居住的地区传教时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在 1524 年，12 名弗朗西斯修会会员的到来，开始了对阿兹特克（Aztec）地区的系统传教活动，这个数字暗比基督教早期的 12 位使徒。”^②在日本和菲律宾，耶稣会最初获得了大批的皈依者。尤其是日本，东南方向的岛民比较倾向于这种新的信仰。沙勿略由此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想法，他竟然幻想在三个月之内，令整个日本皈依基督教。他认为这是因为日本的文化比较高，其人民能够理解主的福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沙勿略对到中国这个文化和制度都十分“先进”的国家传播基督教充满了信心，决定到中国去传教，1552 年，他死于赴中国传教的途中澳门。在中国传教的理想留给了其后辈来实现。

传教活动很快结出初步的成果。在西班牙的殖民地，居民多为未开化或文化水平比较低下的土著。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缺乏宗教、文化上的抵抗力，尤其是传教士得

^① Michael A. Mullet,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p.97.

^② Robert Bireley, *The Refashioning of Catholicism 1450-1700*, p.151.

到了当地殖民政府的支持。在墨西哥，殖民者不仅依靠哄骗和暴力占领了整个国家，占领者“科尔特斯还强迫部落酋长的儿子接受宗教教育。”^① 欺骗和恐吓并举，所以传教活动进行得比较顺利。“到1600年，来菲律宾的传教士以达到130多人，发展信徒20多万，建立230座教堂。”^②当然，我们不能过分强调暴力在传教过程中的作用，不少传教士是本着基督教济世救人的意愿展开自己的传教工作的，说服教育在传教活动中占有相当大的成分。这些早期传教士一般都是学识比较渊博，信仰虔诚的人，他们热情的传教活动对其传教地区的居民有着很强的号召力和感染力，自愿信奉基督教的人至少与被迫接受基督教的人一样多。沙勿略在东方的传教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在东方，从沙勿略1549年到达日本，“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天主教在日本的事业战士给人一种繁盛的景象（宣称估计在1582年有150,000名日本基督徒，在1609年达到222,000名）。”^③在1575年，罗马举行朝圣年时，耶稣会的日本代表团出现在基督教世界人们的面前。

但天主教在海外的传教活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反复和斗争是常态。这种斗争既发生在传教者与当地居民、政府之间，也发生在传教者和殖民当局之间。甚至在传教者之间，由于传教目标和宗教理想的差异，竞争和争斗也很激烈。由于特伦特改革之后，教会的教义变得明确化了，更由于与新教的斗争，这一信仰纲领逐渐趋向于僵硬和教条化，因而缺乏灵活性和变通性。造成传教者不能因地制宜地与本地信仰和风俗相调和，而这对于天主教信仰在海外的成功是不可少的。

天主教在海外受到传教地区居民的传统文化和信仰的强有力抵制，大大地降低了传教的成果。在东方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更是如此。利马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在中国虽然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例如他先后使张廷玉、李之藻、徐光启等人皈依了天主教，还赢得了中国的康熙皇帝的信任。但却遭到中国儒家思想的代表——士绅阶层的排斥和打击。因为“天主教虽然在中国存在下来，但他却未能在中国的文化官僚精英阶层接受到多少皈依者。”^④在日本，相似的情况以对基督教的完全拒斥和对基督教信仰者的屠杀的极端方式被施行。结果，日本的天主教信徒几乎被屠杀殆尽。

即使在伊比利亚半岛国家的海外殖民地，传教的实际效果也值得怀疑。许多土著信徒虽然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但传统的信仰依然存在。只是这种崇拜开始借助于天主教信仰的形式，因而变得更隐秘。为此天主教在美洲等殖民地组织了教区系统，开始对信徒的信仰进行严格的规制和监督。这必然加大天主教对君主的依赖。依靠殖民当局的力量强制信徒遵守欧洲化的天主教信仰形式。君主的帮助一方面可以帮助教会实现宗教理想，“不过，在另一个意义上说，政治需要决定传教政策。”^⑤这也对天主教信仰的传播造成了损害。福音传教的宗旨与殖民统治的现实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传教士中不乏为土著居民的权利进行维护的人，如著名的维多利亚和苏

^① 张文建：《天国之道——基督教》，第178页。

^② 张文建：《天国之道——基督教》，第180页。

^③ R. Po-chia Hsia, *The World of Catholic Renewal 1540-1770*, p.181.

^④ R. Po-chia Hsia, *The World of Catholic Renewal 1540-1770*, p.181.

^⑤ Sabine MacCormack, "The heart has its reason": predicaments of Missionary Christianity in Early Colonial Peru", in David M. Luecke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The Essential Readings*, p.212.

萨雷斯，并且土著人的人权也得到教皇和西班牙国王的承认，但经济和政治的考虑不会为信仰做任何实质性的让步。这样在传教过程中，他们被看成殖民统治的工具，而在某种程度上讲，他们的活动也确实导致这样的结果。虽然如此，我们必须承认，不少传教士为保护土著居民免遭殖民当局的迫害和剥削做出了贡献，他们的态度也是真诚的。

为了推进海外传教事业，克服存在的矛盾和障碍，教皇和教廷在密切关注这一活动进程的同时，开始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来对其进行管理和协调。“1568年7月，庇护五世在圣方济格·博尔基亚的建议下，建立了一个枢机主教会议，以便在异教地区传教，同时建立了一个与其平行的组织，从事对欧洲持异端者的改宗工作。”^① 1622年，罗马建立了传教部。在布满世俗事务的各管理机构之外，设立针对海外传播基督教信仰的专门组织，说明现在教皇和教廷已经将信仰问题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这在特伦特改革之前是很难想象的。不仅如此，为了给海外传教活动培养称职的传教士，为了巩固教会已经在海外取得成果，罗马设立了专门的学院。“1580年，为教育欧洲和日本的学生，建立了两个神学院：一所大学，圣保罗大学，在同一年开办；在招收的新学员中，接受了六名欧洲人和六名日本人。”^②正是对传教士的精心培养，尤其是对天主教传播到的地区的神职人员的培养，保证了天主教信仰可以适应传教地区的风俗习惯和不同的政治、经济形式，从而为天主教成功传播到整个世界提供了保障。

“在欧洲和远远超出欧洲的传教活动大大扩展了罗马天主教所影响的地区。”^③传教活动还产生教会不曾考虑的结果，那就是他增大了文明之间的交流和碰撞，这种交流和碰撞对双方的塑造都是十分强烈的。在这个角度上说，在塑造近代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教会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这种作用是好坏参半的。而且对交流双方来讲，这种作用也是不平衡的。

^① [英]R. B. 沃纳姆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反宗教改革与价格革命》，第72页。

^② R. Po-chia Hsia, *The world of Catholic renewal 1540-1770*, p.182.

^③ [英]R. B. 沃纳姆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反宗教改革与价格革命》，第58页。

结 语

当西方文明的历史跨入中世纪晚期，社会发展进程明显加快，一系列的变化发生，社会处于急剧动荡之中，社会上的每个阶层都受到冲击，社会矛盾激化，变动的社会要求每个组织和机构做出反应，“生存还是死亡？”教会也不例外。

这种变动反映在宗教信仰层面上，笔者认为，天主教必须面对和予以解决的问题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来自于教会的组织机构和成员。教会过往的丑闻降低了教会在信徒心目中的形象，教会内部权力体系的不稳定以及教皇对世俗政治的沉溺，对信仰造成了破坏性影响。而由之而来的日益严重的世俗化，更使教会弊端丛生。教会内部滥权行为日趋严重，神职人员中道德和风纪日益败坏。信徒中出现敌视教皇和教士的情绪，教会处于危险之中。教会客观上面临着对自己的权力结构、组织系统进行调整和改造；对成员的风纪进行整肃的任务。另一个来自信仰仪式领域。随着人们对救赎探寻的频繁和日益深入，教会那繁杂的神学体系和众多的仪式礼仪与人们寻求一种清晰、明确的信仰的要求产生了冲突。人们旺盛而频繁的探求无法为自己带来关于救赎的明确保障，焦虑和不安促使人们要求教会对此予以郑重地答复。

像历史上无数次对自己重塑以对环境适应一样，教会又一次开始了重塑自身的过程，这种重塑是以改革的方式来实现的。这种改革起初是自发地，非统一地在基督教世界的各个地区由各组织和机构或者个人来进行的。各个修道院开始改组，新的修会组织相继建立，并投身于社会实践活动中，给天主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改革意识的加强，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逐渐取得声势并日益在天主教等级机构中向上爬升，直到教皇对改革的态度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教皇站在改革的最前沿，直接促成了天主教世界进行改革的里程碑——特伦特公会的召开。

特伦特公会对于天主教改革的意义，主要在于它解决了天主教在中世纪晚期面临的信仰需要明确；教会的权力体系需要调整；教会的风纪需要整肃等重大问题。虽然在特伦特公会上，对信仰的确定依据主要是天主教的传统，具有很大的继承性，但围绕着新教的神学观点对天主教神学观点的阐释和界定，不仅清晰化了天主教与新教的分歧，而且净化了中世纪晚期以来教会繁复和混乱的神学。并通过与对新教分歧的部分的强调，使天主教的信仰体系变得更加明确，形成了较为清晰的信仰纲领。从这个角度讲，天主教改革不亚于一次重生。

特伦特公会以后，改革开始在天主教各个组成系统轰轰烈烈地展开。各个教区的主教和修会组织首脑秉承特伦特公会的改革精神，在自己所辖范围内，展开了对天主教的组织机构和神职人员的改组和整肃。经过改革，教会风纪得到整肃，神职人员的道德和对信仰的虔诚得到提升，其直接体现是受到神学院教育的忠诚与天主教信仰的

新型教士的出现。

通过改革天主教逐渐恢复了生机和活力，这一复兴的过程由于新教的竞争和威胁而充满了对抗性的色彩。首先感受到天主教复兴造成的影响的也是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的新教各个派别。在重新充满自信和力量的天主教的有力反击下，新教的传播受到遏制，边界开始收缩。与之相应的是天主教统治区域的扩大，许多地区和人们重新回到天主教的怀抱。这一过程充满了暴力和欺骗。虽然天主教以不能回复中世纪晚期的一统天下的局面，但在各天主教世俗君主的支持下，在无数忠诚于天主教信仰的信徒的努力下，天主教在西欧的大多数国家重新确立了自己独尊的地位。

特伦特公会后，天主教有了一套明确的信仰纲领，它开始将这套纲领带到广大天主教世界的信徒当中，去破解存在于信徒中的信仰混乱和模糊的局面。在教会的不懈努力下，民众中存在的带有迷信和异教信仰色彩的信仰逐渐被剥离，天主教信仰日益明确地被信徒所感知，信徒们在信仰上有了明确的保障，在这一过程中，教会对人们的控制从精神层面向外部延伸，加大了对信徒行为的控制，而这就加大了对世俗君主的依赖，教会日益从属于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天主教在塑造自己的过程中，也对近代国家的产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教会在塑造自己适应变动的社会的过程中，也参与了近代世界的塑造过程，通过向新发现的海外世界的传教活动，天主教传播到亚、非、拉丁美洲各个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而这对于近代世界历史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回首长期以来在认识近代早期天主教历史中存在的“天主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之争，我们可以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笔者认为，无论天主教改革还是新教的改革都是针对中世纪晚期变动的社会做出的适应性反应。在新教的宗教改革发生以前，这种反应在天主教内就已存在，并正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刻的程度上进行。新教改革爆发后，这一带有自下而上特点的改革继续并加速展开，逐渐在教会等级结构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持。受到新教威胁和刺激，以教皇为首的教会高层认识到改革对于教会存亡的意义，对改革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从保罗三世开始，教皇成为改革的主要推进者，在特伦特公会上，天主教将自己的信仰与新教的信仰明确地区分开来，扭转了早期在新教发展中的不利局面，获得重生的天主教与新教展开了对信徒的争夺，这种争斗在一个信仰热情高涨的时代，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天主教方面看来，这是正统信仰对抗反正统的异端、叛教者的活动。而对新教来说，这是一场针对“纯洁教会”运动而进行的合乎基督教传统的一场反动。

参考文献

一、英文原著：

- [1] Ahlgren, T. w. Gillian. *Teresa of Avila and the politics of sanctity* [M]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 [2] Bireley, Robert. *The Refashioning of Catholicism 1450-1700: A Reassessment of the Counter Reformation*[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 [3] Cowie, L.W.. *Sixteenth Century Europe*[M].Hong Kong: Wah Cheng Printing Press, 1977.
- [4] Clark, Sir Geoge. *Early modern Europe: From about 1450-1720*[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5] Doran, Susan. *England and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 [6] Duffy, Eamon. *The Stripping of the Altars: Traditional Religion in England1400-1580* [M]. New Haven, CT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7] Davidson, N. S.. *The Counter Reformation*[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7.
- [8] Forster, Marc R. *The Counter-Reformation in the Villages: Religion and Reform in the Bishopric of Speyer 1560-1720*[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 [9] Grell, Ole Peter, et.al.. *Health Care and Poor Relief in Counter-Reformation Europe*[M].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10] Hsia, R. Po-chia. *The World of Catholic Renewal 1540-1770*[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1] Hillerbrand, Hans J.. *Men and Idea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M].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Inc., 1969.
- [12] Jones, Martin D.W..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3] Klassen, Peter J.. *Europe in the Reformation*[M]. London: Prentice-Hall, Inc, 1979.
- [14] Koenigsberger, H. G. & Mosse, George L..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M]. London: Longman Group Ltd, 1968.
- [15] Lytle, Guy Fitch, ed. . *Reformation and Authority: in the Medieval and Reformation Church*[C]. Washington D. 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6] Lubeck, M. David. ed.. *The Counter-Reformation: The essential readings* [C]. Malden, Mass.: Blackwell, 1999.
- [17] Mullet, Michael A..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18] O'Malley, John W.. *Trent and all that: Renaming Catholicism in the Early Modern*

Era[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9] Portner, Regina. *The Counter-Reformation in Central Europe Styria 1580-1630*[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20] Pettegree, Andrew. ed.. *The Reformation World*[C].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21] Scribner, R. W.. *The German Reformation*[M].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86.
- [22] Thrupp, Sylvia L.. ed.. *Changes in Medieval Society*[C]. New York: Meredith Publishing Company, 1964.
- [23] William Doyle. *The Old Europe Order 1660-1800*[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二、中文译著：

- [1]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 菲利普·李·拉尔夫. 世界文明史·第二卷[M]. 罗国经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年.
- [2] [德]爱德华·傅克斯. 欧洲风化史·文艺复兴时代[M]. 侯焕阁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 [3] [法]查理·斯托菲. 宗教改革 1517-1564[M]. 高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年.
- [4] [俄]德米特里·梅列日柯夫斯基. 宗教精神: 路德与加尔文[M]. 杨德友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年.
- [5] [英]恩·贡布里希. 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 从远古到现代[M]. 张荣昌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
- [6] [英]G. R. 埃尔顿主编.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宗教改革(第二卷)[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 [7] [英]肯尼斯·摩根主编. 牛津英国通史[C]. 王觉非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 [8] 马克思, 恩格斯.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年.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年.
- [10] [德]马克思·布劳巴赫等著. 德意志史·从宗教改革至专制主义结束·上[C]. 陆世澄, 王昭仁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年.
- [11] [法]皮埃尔·米盖尔. 法国史[M]. 蔡鸿滨、王文融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年.
- [12] [法]皮埃尔·弗雷德里·勒内·迪卡尔先生在他的时代[M]. 管震湖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年.
- [13] [英]R. B. 沃纳姆主编.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反宗教改革与价格革命(第三卷)[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
- [14] [英]托马斯·马丁·林赛. 宗教改革史[M]. 孔祥民、令彪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年.
- [15] [英]温斯顿·丘吉尔. 英语国家史略[M]. 薛力敏、林林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5年.
- [16] [美]威利斯顿·沃尔克. 基督教会史[M]. 孙善玲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
- [17] [美]威尔·杜兰. 世界文明史·信仰时代[M]. 幼狮文化公司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8年.
- [18] [英]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 牛津基督教史[C]. 张景龙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5年.
- [19] [荷兰]约翰·赫伊津哈. 中世纪的衰落[M]. 刘军等译.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7年.

三、中文著作：

- [1] 丁建弘. 德国通史[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
- [2] 杜 美. 德国文化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 [3] 蔡 骥. 英国宗教改革研究[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
- [4] 罗竹凤. 基督教通史简编[C].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
- [5] 马克垚. 世界历史·中古部分[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
- [6] 马超群. 基督教二千年[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年.
- [7] 杨 真. 基督教史纲[C]. 上海：三联出版社，1979 年.
- [8] 张 绶. 基督教会史[M]. 上海：三联出版社，1992 年.
- [9] 张文建. 天国之道——基督教[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年.
- [10] 朱孝远. 近代欧洲的兴起[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年.

四、论文类：

- [1] 田 垣. 巴托罗缪之夜—法国历史上的一桩宗教惨案[J]. 世界宗教文化，1998，1.
- [2] 王新中. 对欧洲中世纪天主教改革性质的理论思考[J]. 山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 [3] 彭小瑜. 教会史的学科界定于方法论—以宗教改革和宗教裁判所研究为例[J]. 西学研究，2003，1.

后 记

当过往的尘埃因时间的流逝而凝结下来以后，回首奔波的历程，在不经意间获得喜悦的同时，内心似乎总免不了夹杂一丝丝怅惘和无奈。告别培育我三年的校园和导师，告别给与我关怀和帮助的友人，告别我人生的又一个阶梯，不能不令我伤怀。我内心清楚地明白，师大给予我的教育和锻炼将是我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获得自信的源泉。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历经增删、修改的这篇不成器的小文终于得以完成。它在使我对“学问”一词从此有了更深沉的感受的同时，更使我觉得愧对我的授业恩师王晋新教授的期许。记得三年前，我徘徊于燕园之内，虽无十分的沮丧，却也难免步履蹒跚。虽无一面之缘，先生却不避我的愚钝，将我列入门墙。从此求学有路，心有所依。三年中，先生不辞劳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和育人态度将长久地印于我的记忆。在写作本文时，每当夜深孤寂的感觉袭来时，想起拜访先生时，先生伏案苦读的身影都会为我频添执著和勇气。出身寒微，列入门墙时已届而立的我，羁旅之心和动摇之意时时萦绕。是先生和师母（孙木函女士）的关怀和照顾，让我在师大找到了温暖和家的感觉，坚定了求学之志。其间点点滴滴，心同身受，至今犹历历在目。而我的论文，从选题历经写作，到最后完成，无不凝结着先生的汗水和智慧，这怎是一个谢字可能涵盖？

在三年的学业将划上终止符的此时此刻，难忍一番反思。令我感悟最深的依然是本文的完成，它不是我一人之力，在其每一滴一语之中，都凝结着国内外无数学者的心血和汗水，对于他们我只能高山仰止并献以无尽的崇拜之情。既往的三届博士师兄，尤其是现任教于黑龙江大学法学院的魏建国师兄，对于我思维和思路的形成和开阔都起了莫大的作用，略过他们对我是不可想象的。在本文写作最困难时，孙义飞师兄和陈金锋师姐都曾不吝指教，在此一并答谢。同时，我要感谢徐家玲教授、周巩固教授、宫秀华教授对本论文选题的指导，感谢资料室教师杨曼女士提供的方便，感谢我的好友朱士军以及所有这里我无法一一列出姓名的学友们，正是他们的帮助使我顺利地完成学业以及本文的写作。

最深沉的祝福奉献给我的父母和弟弟，正是他们用朴实的爱对我的关怀，对我求学之路的无私支撑，使我历经艰难而依然固守自我。我的获得正是建立在我的家人的汗水之上！每念及此，不禁泪汗涟涟。寸草之心，如可报答三春之辉，吾愿足矣！
汗水之上！每念及此，不禁泪汗涟涟。寸草之心，如可报答三春之辉，吾愿足矣！

韩福秋

谨记于 2006 年 5 月 25 日，长春